



上海金融与发展实验室
SHANGHAI INSTITUTE FOR FINANCE & DEVELOPMENT

半月度
报告

金融与发展

海外观点

2022年/总第236期

目 录

世界热点

俄乌战争如何加剧中东地区粮食安全问题 3

导读：俄乌战争正在威胁中东北非地区急需物资的正常供应，但某些国家比其他国家更容易受到粮食短缺和局势动荡的影响。

乌克兰战争，世界粮食价格，非洲冲突 6

导读：乌克兰正在发生的人道主义灾难引起了全世界决策者的注意。然而，俄罗斯入侵乌克兰的后果可能会远远超出对两国的影响。本文借鉴了最近的研究，讨论战争对食品价格的影响如何影响非洲暴力冲突的分布。作者预测，群体间冲突总体上会增加，但这包括各国之间的巨大空间差异，最大的农业生产者由于工资上涨而表现出冲突的减少。

东非粮食危机五问 10

导读：埃塞俄比亚和乌克兰的冲突正在加剧，导致东非地区数百万人面临严重的粮食短缺危机。这一现状是多种因素层层叠加、互相影响的结果。面对这一困境，大国们应当马上提供强有力的人道主义援助，以帮助非洲国家度过危机。

IMF 和世界银行如何支持因俄乌冲突而遭受重创的非洲经济体 12

导读：俄罗斯对乌克兰的入侵对非洲国家也具有重大的经济、政治和社会影响。如果不迅速采取行动支撑非洲经济，债务违约、饥饿和不稳定等问题可能随之而来。

农产品和能源依赖进口的发展中国家受俄乌战争的影响最大 18

导读：俄乌战争正在扰乱全球基本商品的供应，推高价格，减缓贸易并降低收入。本文认为，在发展中国家里，农业和能源进口大国受到的打击最为严重。虽然一些大宗商品出口国可能会增加出口以从不断上涨的全球价格中受益，但它们可能会经历贸易模式的重组，导致与全球价值链的融合度降低。世界各地的消费者情况更糟，最贫穷的人受到的不利影响最大。

补充营养援助计划参与者与新型冠状病毒大流行初期的高度食物不安全 23

导读：新型冠状病毒大流行使生活贫困的家庭，尤其是黑人和拉丁美洲家庭承受了不成比例的压力。食物不安全是大流行的一个关键后果，它意味着获得足够数量营养食品的机会变得有限或不确定。我们研究了参加补充营养援助计划（SNAP）的人是如何受到大流行的影响的，尤其是黑人参与者和居住在食物荒漠的参与者。

日本物价发展特征 34

导读：2022年3月29日，题为“日本物价发展特征”的“新冠肺炎疫情大流行期间物价发展问题”的第一次研讨会在日本银行总行举行。以新冠肺炎疫情后日本、美国和欧洲的消费者物价变化差异为切入点，经济学和实证分析领域的专家学者围绕日本物价变化特征展开了热烈的讨论。

俄乌战争如何加剧中东地区粮食安全问题

Kali Robinson/文 徐懿凡/编译

导读：俄乌战争正在威胁中东北非地区急需物资的正常供应，但某些国家比其他国家更容易受到粮食短缺和局势动荡的影响。编译如下：

俄罗斯对乌克兰的入侵已经危及整个中东及北非地区（Middle East and North Africa, MENA）的粮食供应，该地区的许多国家严重依赖进口，尤其是小麦等主食。由于气候变化、水资源紧张以及新冠疫情，粮食安全问题已经成为该地区的一项重大挑战。

中东北非地区的粮食不安全状况有多严重？

中东北非地区一些国家的粮食不安全状况比其他国家更严重。今年早些时候，当俄乌战争开始造成食品供应中断的时候，一些国家就已经处于水深火热之中。例如，在叙利亚和也门，多年的冲突和围困中的经济使许多居民即便在有粮食的地方也难以负担粮食价格。

与此同时，黎巴嫩的粮食价格在过去 3 年里上涨了 1000%以上，因为该国的政治经济形势已经陷入混乱，黎巴嫩货币对美元的汇率大幅下跌。2020 年贝鲁特港口（Beirut）爆炸摧毁了该国主要的粮仓，大大削弱了该国的粮食储存能力。

同样还有突尼斯，糟糕的财务状况使得当地政府不足以向食品供应商支付货款，造成了物资短缺问题，让已经被高失业率和不稳定政局激怒的人民更为痛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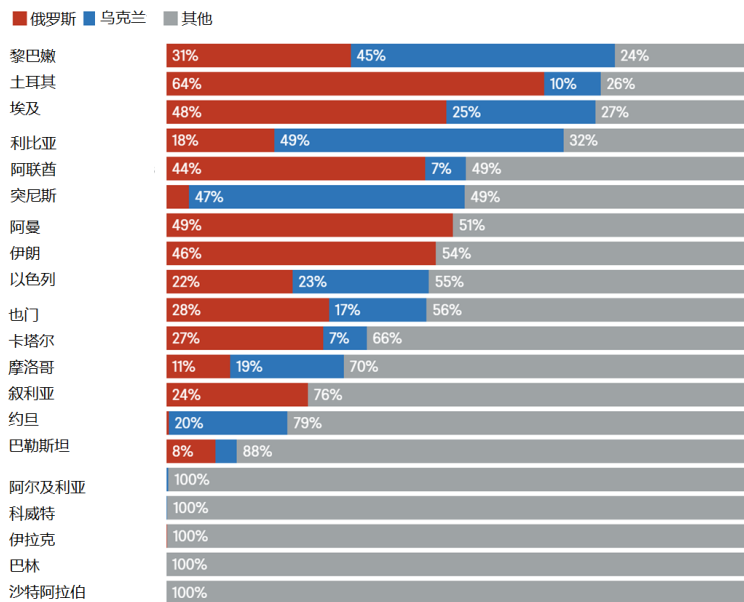
此外，由于新冠疫情肆虐，整个中东北非地区的粮食供应也受到了影响。例如，自 2020 年初以来，小麦价格已经上涨了 80%。

俄乌战争是如何使局势恶化的？

俄罗斯和乌克兰被称为世界粮仓：两国都是小麦、玉蜀黍、玉米和大麦等谷类作物的主要出口国。根据经济复杂性观察组织（Observatory of Economic Complexity）的数据，2020 年俄罗斯和乌克兰都将生产的小麦大约一半送往中东和北非国家。

哪些中东和北非国家的小麦依赖俄罗斯和乌克兰？

按2019年小麦进口来源分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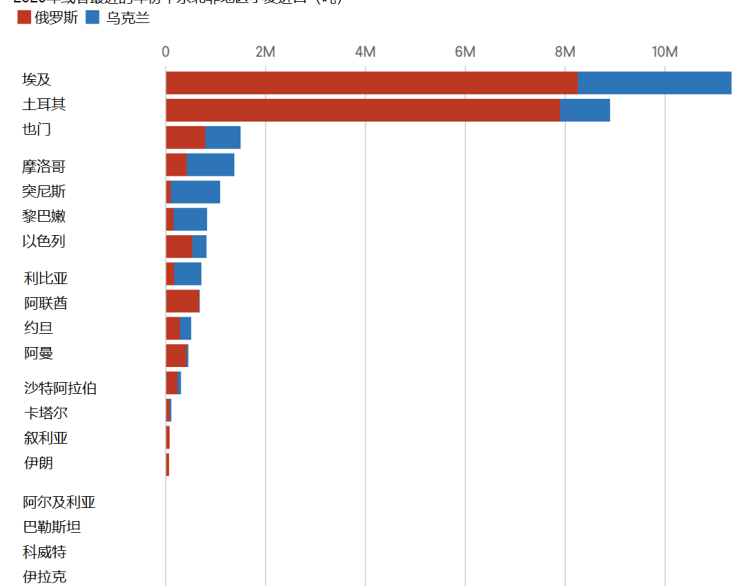


来源：经济复杂性观察组织

COUNCIL on FOREIGN RELATIONS

埃及和土耳其从俄罗斯和乌克兰进口小麦最多

2020年或者最近的年份中东非地区小麦进口（吨）



注释：除叙利亚为2019年数据，巴勒斯坦地区为2018年数据外，其余皆为2020数据

来源：联合国粮农组织

COUNCIL on FOREIGN RELATIONS

战争破坏了这个地区最需要的小麦以及油籽、食用油和化肥等其他物资的供应。预计 2021-2022 年俄罗斯和乌克兰的出口总额中，约有四分之一的小麦和一半的玉米出口受阻。在乌克兰，许多保障贸易的基础设施比如港口和铁路都已被摧毁或受损。乌克兰还禁止了一些谷物的出口以保护本国的供应。

此外，即使战争很快结束，冲突也可能继续阻碍农业发展；联合国粮农组织估计，由于战争，乌克兰 30% 的农作物种植区将无法种植或收获。

对中东北非地区的穆斯林来说，当前的时间尤其麻烦：在 4 月初开始的斋月期间，家庭在白天禁食之后通常会消耗比平均水平更多的食物。战争爆发后不久，整个地区都出现了恐慌性购买，因为公众尤其担心斋月期间的食物供应短缺。

中东北非地区的穷人面临的风险最大。他们在食物上的支出占收入的比例更大，并且他们很可能是农民，所以种子和化肥短缺对他们的打击最大。预计那些依赖国际粮食援助的人也将面临进一步的困难；乌克兰和俄罗斯是世界粮食计划署小麦、玉米和葵花籽油的主要供应国。

该地区将如何应对？

这场危机让许多政府争相改变政策，寻找替代方案。例如，摩洛哥暂停了一些食品出口以支持国内供应。埃及有几个月的粮食储备，并从阿联酋获得了资金以帮助维持国内的面包价格，同时埃及也考虑美国、澳大利亚和印度等主要粮食生产国作为替代合作伙伴。土耳其也可以走类似的道路，其作为海湾阿拉伯国家——人口比邻国少，同时更富有——更容易获得新供应商。伊朗和俄罗斯签署了一项协议以确保进口。专家表示，黎巴嫩、利比亚、叙利亚和也门等这些局势严重不稳的国家将难以有效应对。

分析人士说，各国政府将尽量避免提高面包价格。在许多国家，面包补贴被认为是社会契约的一部分，不断上涨的价格可能会引发动乱——2010 年俄罗斯小麦收成不佳导致价格上涨，引发了被称为“阿拉伯之春”的地区起义。与粮食有关的骚乱最有可能在人们已经对政府感到失望的国家爆发，比如突尼斯，但该地区目前还没有大规模的抗议活动。

本文原题为“[How Russia’s War in Ukraine Could Amplify Food Insecurity in the Mideast](#)”。本文作者 Kali Robinson 报道中东新闻，并担任《每日新闻简报》的编辑。在加入 CFR 之前，她曾在半岛电视台卡塔尔多哈总部和美联社华盛顿分部实习。本文于 2022 年 4 月 21 日首刊于 CFR 官网。[单击此处可以访问原文链接。](#)

乌克兰战争，世界粮食价格，非洲冲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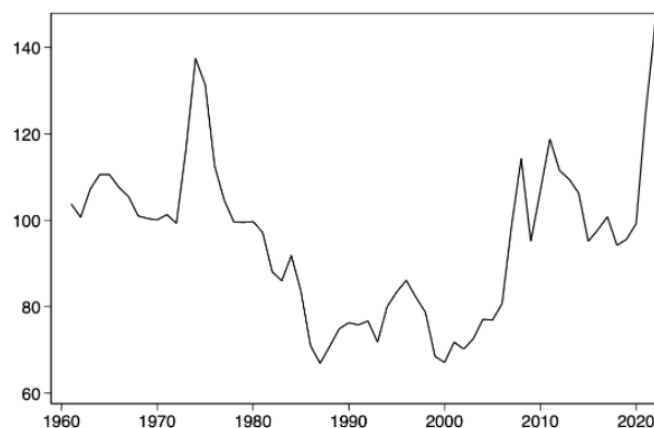
Eoin McGuirk, Marshall Burke /文 张丝雨 / 编译

导读：乌克兰正在发生的人道主义灾难引起了全世界决策者的注意。然而，俄罗斯入侵乌克兰的后果可能会远远超出对两国的影响。本文借鉴了最近的研究，讨论战争对食品价格的影响如何影响非洲暴力冲突的分布。作者预测，群体间冲突总体上会增加，但这包括各国之间的巨大空间差异，最大的农业生产者由于工资上涨而表现出冲突的减少。编译如下：

俄罗斯和乌克兰的小麦和大麦出口总额占全球的近 30%。同时，乌克兰占全球玉米贸易的 14%和全球葵花籽油贸易的 75%，葵花籽油是一种关键的烹饪燃料。由于目前的冲突，这些商品的供应受到严重阻碍。就乌克兰而言，这在一定程度上收黑海航线中断的影响。就俄罗斯而言，这是由于制裁对农业供应链的影响。再加上世界范围内的极端天气模式（例如印度、美国和法国部分地区的高温；东非历史上的干旱；以及中国的洪水）和不断上升的保护主义，主食价格急剧上涨给发展中国家的贫困家庭带来了巨大的福利损失（Arezki 2022, Artuc et al. 2022, Porto and Rijkers 2022）。

为了把这些近期变化放在历史背景下来看，我们在图 1 中绘制了 1961 年至 2022 年粮农组织实际粮食价格指数。目前的数字是 145.5，创历史新高，轻松超过了上世纪 70 年代和 2010 年代初的峰值。最近的增长主要是由谷物和植物油推动的。

图 1：1961-2022 年粮农组织实际粮食价格指数



从欧洲冲突到非洲冲突

了解这些粮食价格冲击对非洲冲突的下游影响至关重要。国家的脆弱性和反复发生的内战是许多非洲国家经济发展所面临的代价高昂的障碍。查明经济波动如何以及为何影响国内冲突，有助于为促进和平的政策提供思路。

一种预测是，商品价格上涨将减少特定商品生产地区的冲突。这是因为受影响部门的生产力提高会增加工资，从而增加边际工人参与非法或高风险经济

活动的机会成本，如加入武装团体（Dal Bo and Dal Bo 2011）。因此，这一预测与劳动密集型行业特别相关，例如哥伦比亚的咖啡生产和更普遍的非洲作物农业（Dube and Vargas 2013, Berman and Couttenier 2015, McGuirk and Burke 2020）。

然而，正如 McGuirk 和 Burke（2020）中记录的那样，一些反补贴机制同样存在。通过这些机制，较高的主食价格可以增加冲突。由于粮食占非洲家庭支出的很大比例（平均约 40%），粮食价格冲击对个人的净影响将取决于一个人是相关商品的净生产者还是净消费者。可以想象，足够高的粮食价格会迫使净消费者转而采取危险的经济应对策略，以保持必要的卡路里摄入量，特别是在缺乏传统的金融平滑机制的情况下。因此，正如价格上涨可能诱使边际工人避免参加生产作物地区的武装团体一样，价格上涨也可能诱使边际工人参加消费作物地区的武装团体。

我们在论文中找到了这些抑制效应的证据。我们研究了食品价格上涨对非洲 0.5 度网格（赤道面积 55 公里×55 公里）的群体间冲突发生率的影响。我们创建了两个转移份额工具来区分渠道：一个“生产者价格指数”（PPI），结合世界粮食价格的时间变化和跨细胞作物生产的横截面变化；一个“消费者价格指数”（CPI），而是使用跨国国家作物消费的横截面变化。我们估计，生产者价格指数每上升一个标准差，一个单元内的冲突就会减少平均数的 17.2%，而 CPI 每上升一个标准差，一个单元内的冲突就会增加 8.6%。我们的估计表明，通过消费者价格指数效应最有可能爆发冲突的国家是卢旺达、冈比亚、塞拉利昂、索马里、史瓦济兰/埃斯瓦蒂尼、中非共和国、吉布提、莫桑比克、南非、津巴布韦、加纳、尼日尔和马里。

我们可以利用这些估计数据来预测 2022 年 1 月至 4 月小麦和玉米价格上涨的具体影响，主要影响因素为乌克兰战争。从 PPI 效应角度看，冲突下降了 1.7%。从 CPI 效应角度看，冲突增加了 6.17%。由于生产者价格指数效应只与农作物生产地区有关，我们估计俄罗斯入侵的加权平均数效应是非洲群体间冲突增加了 5.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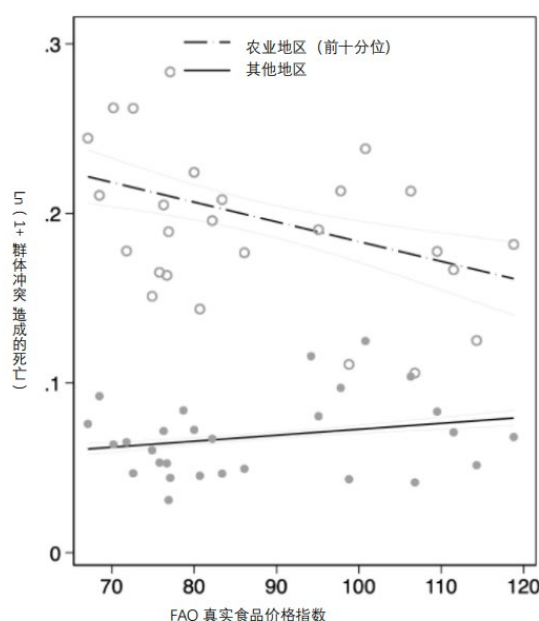
在图 2 中，我们使用更新后的原始数据图形化地说明了这些关系。简单起见，我们使用粮农组织的粮食价格指数（同样是实际价格），由于指数公开，所以随着时间推移的数据很容易追踪。我们简单地绘制了 x 轴上的食品价格指数与 y 轴上一个单元年内群体间冲突事件死亡率的自然对数之间的关系。¹我们

¹ 冲突数据来自乌普萨拉冲突数据项目（UCDP）（<https://ucdp.uu.se/>）。

将这些事件称为“因素冲突”，因为它们通常反映有组织的武装团体之间争夺领土控制权的冲突。

为了区分抑制效应，我们将样本分成两种地区。“农业地区”被定义为收获面积最高的十分之一，这意味着地区内至少 22%的土地面积用于作物生产（Monfreda et al. 2008）。这些地区包含了大约 42%的非洲人口。“其他地区”就是剩下的部分。图 2 中的图表表明，50 点的价格飙升（与 2019 年至 2022 年之间的变化幅度类似）与农业地区的死亡率下降 5.8%和其他地区的死亡率上升 1.8%相关。

图 2：粮农组织实际食品价格指数与农业与其他地区间“因素冲突”死亡率之间的关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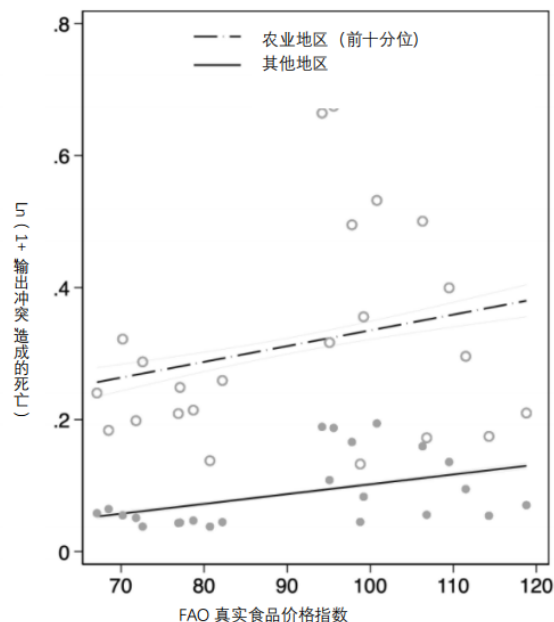
第二种抑制效应与通常所说的“粮食骚乱”有关。学者们早就记录了历史上粮价快速上涨在骚乱、示威、抢劫甚至农民叛乱爆发中的作用（Bellemere 2015, Ubilava 2022）。这些行动不同于群体间的因素冲突，它们通常是为了影响政策（通过示威）、获得产出（通过抢劫）或表达不满而执行的更独立和不协调的决定，因为不平等往往伴随着食品价格飙升而受到严重冲击。由于净消费者的存在，这些事件可以在农业和非农业地区发生。我们将它们标记为“输出冲突”事件，在 ACLED 数据集中以骚乱、示威或其他针对平民的暴力来衡量。²

我们估计，生产者价格指数和消费者价格指数每上升一个标准差，产出冲突的可能性就会分别增加 18.9%和 14.4%。与要素冲突不同，这里的价格冲击导致农业和非农业领域更多的冲突。

² 见 <https://acleddata.com/#/dashboard>

我们再次利用图 3 中粮农组织粮食价格指数的最新数据以图形方式说明这种关系。图表说明，在这两种地区内，更高的价格导致更多的产量冲突死亡。因此，总体效果是明确的。

图 3：粮农组织实际食品价格指数与农业与其他地区“产出冲突”死亡人数之间的关系



结论

总而言之，俄罗斯入侵乌克兰导致了历史上主要食品价格的大幅增加，这反过来又可能影响到未来一年非洲冲突事件的空间分布。我们预测，群体间的“因素冲突”事件将从最具生产力的农业区域转移到农作物产量较低的地区。我们的估计表明，不断上涨的价格也将导致更高的“产出冲突”的可能性——在食品生产和消费地区发生较小规模的骚乱、示威和/或平民暴力。提高非洲农业生产力的政策有可能保护生产者和消费者今后免受国际价格波动的有害影响。

本文原题为“[The Price of War: Macroeconomic Effects of the 2022 Sanctions on Russia](#)”。作者 Eoin McGurk 和 Marshall Burke。Eoin McGurk 是塔夫茨大学经济学助理教授和纽鲍尔学院研究员，研究方向是发展和政治经济学，特别关注政治暴力和社会分裂的原因和后果。他拥有都柏林大学三一学院经济学博士学位，并曾是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富布赖特学者。Marshall Burke 是斯坦福大学地球系统科学系副教授、食品安全与环境中心研究员、美国国家经济研究局研究员，研究重点是环境变化的社会和经济影响，以及衡量和理解发展中国家的经济生计。他在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获得农业和资源经济学博士学位，在斯坦福大学获得国际关系学士学位。本文于 2022 年 5 月刊于 VOX 官网。[单击此处可以访问原文链接。](#)

东非粮食危机五问

Michelle Gavin/文 申劭婧/编译

导读：埃塞俄比亚和乌克兰的冲突正在加剧，导致东非地区数百万人面临严重的粮食短缺危机。这一现状是多种因素层层叠加、互相影响的结果。面对这一困境，大国们应当马上提供强有力的人道主义援助，以帮助非洲国家度过危机。编译如下：

东非的粮食短缺有多严重？

非洲之角正处于令人绝望的粮食安全危机之中。上个月，世界粮食计划署表示，埃塞俄比亚、肯尼亚和索马里约有 1300 万人面临严重饥饿。但是最糟糕的情况可能尚未到来：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警告说，2022 年，这三个国家的 15 至 200 万人可能面临严重的粮食不安全。与此同时，联合国儿童基金会（UNICEF）警告说，在厄立特里亚、埃塞俄比亚、肯尼亚和索马里，超过 500 万儿童身体和认知发育可能因营养不足而受到永久性损害，因此处于极度危险之中。由于与乌克兰危机相关的全球冲击恶化了粮食安全预测，该地区的前景在最近几周只会变得更糟。

什么因素导致了饥饿危机？

多种因素以层层递进的方式促成了这一后果，这使得许多社区的应对机制和应急计划已经消耗殆尽。气候变化正在导致更极端的天气，受灾最严重的国家连续三年的干旱导致了多次歉收和牲畜牧场的丧失。这些状况反过来又加剧了经济困难，因为农业劳动力已经面临失业，无法赚钱购买食物。2020 和 2021 年，由于铺天盖地的蝗虫群摧毁了农田，情况进一步恶化。新冠疫情导致的全球经济和供应链中断还通过推高价格、消耗储蓄和限制经济机会将更多社区推向边缘。

该地区内外的冲突如何使情况变得更糟？

埃塞俄比亚的提格雷危机导致数十万提格雷人陷入饥荒，这在很大程度上是由埃塞俄比亚政府一年多来严格限制或完全拒绝人道主义进入所导致的。持续的政治不稳定与索马里的气候危机相结合，导致近 300 万人在国内流离失所，进一步扰乱了生计和农业。此外，随着资源的减少以及社区变得越来越绝望，人们开始争夺稀缺的牧场和水资源，粮食不安全本身又成为冲突的驱动因素。

最新对粮食安全前景的打击来自于俄罗斯入侵乌克兰。厄立特里亚、肯尼亚、索马里和苏丹的小麦进口几乎全部来自俄罗斯和乌克兰。与此同时，世界粮食计划署在世界各地分发的一半以上的小麦都来自于乌克兰。供应将受到挤压，包括燃料在内的价格将会上涨，这将使该地区的食品运输更加昂贵。

饥饿会给政治稳定带来哪些风险？

历史上，食品价格上涨曾导致世界许多地区的社会动荡，非洲也不例外。苏丹 2018 年面包价格上涨引发了抗议活动，最终导致奥马尔·巴希尔政府垮台。埃塞俄比亚的粮食安全政治任务繁重到政府防止饥荒的能力是执政合法性的主要标志。在肯尼亚即将举行的选举中，候选人无疑会寻求将他们的反对者与日益严重的粮食危机联系起来，这种策略可能会引发紧张局势。无法想象这场危机不会产生政治影响。

国际合作伙伴应该做些什么来提供帮助？

强有力的人道主义援助对该地区顺利度过未来几个月至关重要。美国与该地区的稳定有着真正的利害关系，已经开始在世界上一些最繁忙和最具战略意义的海上航道沿岸争夺准入和影响力的地缘政治竞争。其他如欧盟国家在内的外部大国也是如此。如果食物短缺和危机导致难民外溢，这些国家可能会接收其中的大部分。他们将需要抵制捐助疲劳，并确保世界各地的各种紧急危机不会削弱响应多边组织呼吁的能力。同时，他们还应向急需帮助的人们提供直接援助。

国际伙伴还应解决危机的根本原因。这需要迅速启动外交努力，以可持续的方式帮助解决使情况不断恶化的冲突。同时，还需要对该地区的气候变化适应和复原力提供更多支持。非洲人正在遭受他们几乎从来没有参与制造的全球性问题的冲击，而主要排放国却没有履行帮助他们应对这些后果的责任。

最后，正如新冠疫情促使许多国家认真审视药品供应链一样，非洲各国政府和全球救援机构应该在当前多层次的危机之后考虑多样化其食品供应链。国际合作伙伴可以在支持加强东非粮食系统的合理战略方面发挥重要作用。

本文原题为“East Africa’s Growing Food Crisis: What to Know”。本文作者 Michelle Gavin 是对外关系委员会（CFR）的非洲政策研究专家。本文于 2022 年 3 月 16 日刊于 CFR 官网。[单击此处可以访问原文链接。](#)

IMF 和世界银行如何支持因俄乌冲突而遭受重创的非洲经济体

DAVID MCNAIR/文 李佳欣/编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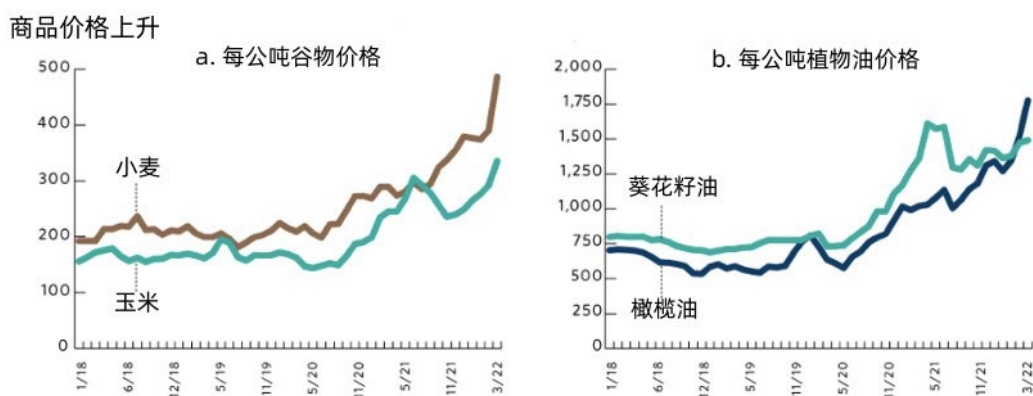
导读：俄罗斯对乌克兰的入侵对非洲国家也具有重大的经济、政治和社会影响。如果不迅速采取行动支撑非洲经济，债务违约、饥饿和不稳定等问题可能随之而来。编译如下：

俄罗斯总统普京对乌克兰的入侵是一个分水岭，它摧毁了乌克兰，造成了欧洲难民危机，并使北约盟国联合起来采取前所未有的措施来对抗俄罗斯的侵略。对于非洲国家来说，冲突的二阶效应加剧了一系列现有的经济和债务挑战，这些挑战已经因新冠疫情而加剧。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应作出果断反应，制定经济方案，避免这些危机对非洲产生最严重的影响。

在入侵之后，小麦、大麦和植物油等主食商品的价格暴涨。3 月份，联合国的食品价格指数创下了历史新高。3 月份比 2 月份增加了 12.6%，现在的粮食价格比一年前高出 33.6%（见图 1）。这部分是因为俄罗斯和乌克兰是世界的粮仓，出口世界三分之一的小麦、四分之一的大麦和 69%的世界葵花籽油。

由于这些商品大部分是通过现在关闭的黑海港口出口的，乌克兰有 2000 万公吨的小麦和玉米在这个季节无法出口。明年收成的种植工作已经被冲突打乱，农民们都去了战场，留下来的农民则面临着燃料和化肥的短缺。

图 1 商品价格上涨



来源：《商品市场》，世界银行，2022 年 4 月，<https://www.worldbank.org/en/research/commodity-markets>。

俄罗斯占全球钾肥出口量的 18%，而钾肥是硝酸盐肥料的关键成分，在入侵前就禁止出口。俄罗斯前总统梅德韦杰夫在 3 月说，该国将“只向其朋友提供粮食和作物”，因为粮食是其“安静的武器”——暗示俄罗斯可能将其出口的粮食商品武器化。

能源市场也出现了大幅波动，石油在 3 月初达到每桶 130 美元，然后再次下跌，因为美国宣布将从其战略储备中每天释放 100 万桶石油以降低价格，其

他石油生产国也是如此。虽然能源价格上涨可能使安哥拉和尼日利亚等非洲商品出口国受益，但这种收益大部分可能被进口精炼石油产品的成本增加所抵消。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历史分析表明，每桶 5 美元的油价上涨使全球产出水平下降了约 0.25%，但对非洲非出口国来说，这一数字增加到了 0.6%。此外，自俄罗斯入侵乌克兰以来，联合国已将其全球增长预测下调了 1%，而 IMF 的《世界经济展望》也可能会下调增长预测。

不满之夏

俄乌冲突与导致 2010-2012 年“阿拉伯之春”抗议活动的条件有明显的相似之处，当时成本的上涨加剧了不满情绪，并催化了广泛的民间骚乱。

粮食不安全和稳定之间的联系是公认的。在 2015 年关于这个问题的一份报告中，美国情报界评估说，“到 2025 年，与粮食有关的重大国家间冲突（战争）不太可能发生，但较小形式的冲突和紧张局势——无论是国家内部各团体之间还是国家之间——都会增加。”报告预测了几个变化：城市里的人将首先受到生活水平下降的影响，但农民和牧民之间的小规模冲突也会出现；恐怖分子和国际犯罪组织将加强对食物来源的控制，以增加他们自己的利益；公海和主要河流流域的争端将上升。

2022 年 4 月，全世界有 8.11 亿人食物摄入不足。在非洲，这与西非和中非的严重饥饿危机交织在一起，世界粮食计划署（WFP）和国际农业发展基金警告说，今年可能有 4100 万人面临粮食危机。在布基纳法索、利比里亚、马里、毛里塔尼亚、尼日尔、尼日利亚、塞拉利昂和多哥，基本主食的价格已经比五年的平均价格高出 40%。在东非，2810 万人面临严重的粮食不安全问题，而 740 万人正经历紧急粮食不安全问题，这意味着“非常高的急性营养不良和超额死亡率”。

随着整个非洲以及阿富汗、叙利亚和也门的需求不断增加，许多关注都集中在人道主义影响和支持粮食计划署等组织的需要上，该组织从乌克兰采购一半的小麦用于人道主义分配，同时正在努力应对需求增加和采购粮食库存的成本上升问题。该组织的执行董事大卫-比斯利警告说，这场危机可能“超出我们自二战以来所看到的任何情况”。

但是，除了严重的人道主义状况外，粮食价格上涨将对非洲家庭的生计产生广泛的影响。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强调，在发达经济体中，食品在消费价格指数中的比例不到 20%，而在撒哈拉以南非洲，这一比例达到了近 40%（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并没有对非洲大陆的这一数据进行细分）。

这些挑战增加了冠状病毒变种的持续风险。世界卫生组织 2022 年 4 月的一份报告估计，到 2021 年 9 月，有 8 亿非洲人感染了这种病毒，然而官方数据表

明这个数字只有 1150 万。2021 年 7 月和 8 月，整个非洲大陆的病例大幅飙升。截至 2022 年 4 月初，该大陆 84% 的人口尚未完全接种疫苗。

债务困境和财政压力加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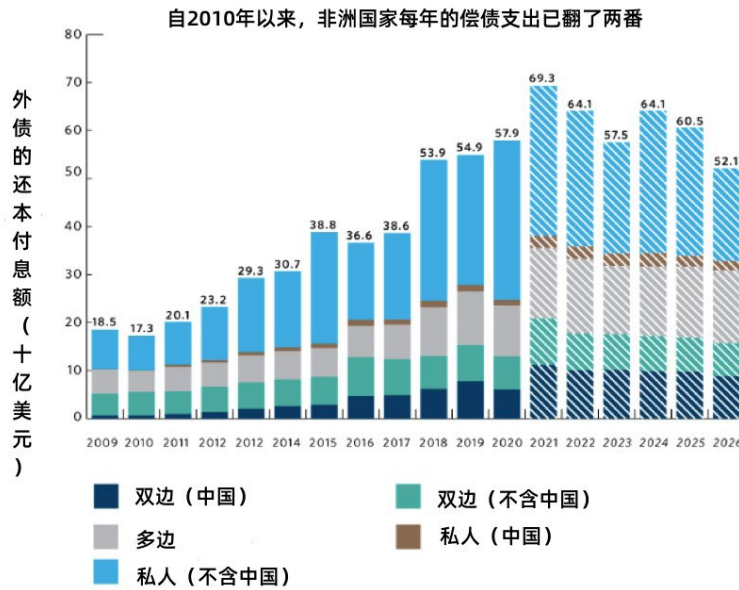
然而，乌克兰危机的影响可能要深得多，因为它与疫情后的经济状况衰弱、先前存在的债务危机以及疫情期间多边机构提供的微薄经济支持相交织。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谈到了部分由疫苗不平等驱动的“巨大差异”。但是，在俄罗斯入侵乌克兰之后，许多国家面临的成本增加，可能会极大地增加债务困扰的风险。

4 月初，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都呼吁对债务采取果断行动。现在有 23 个非洲国家要么破产，要么处于债务困扰的高风险中。非洲的债务水平已经有十多年没有像今天这样高了。随着债务偿还在预算和收入中的比例越来越大，世界上最脆弱的国家的违约潮可能会比预期的更快发生。在 2020 年，低收入和中等收入国家的债务与 GDP 的比率增加了 9 个百分点（而之前十年的年增长率为 1.9%）。

在非洲的政府外债中，57% 是以美元计价的。随着美国联邦储备局发出大幅收紧货币政策的信号，这可能会使非洲国家的当地货币对美元贬值，增加现有债务的实际偿还成本，同时可能增加未来的借贷成本。这就有可能出现所谓的“缩表”现象，即投资者退出新兴市场，借贷成本增加。

这是一个严峻的挑战，特别是在 20 国集团为解决债务挑战所采取的措施正在失败的情况下。该集团的“暂停偿债倡议”（DSSI）在疫情的高峰期为双边债务的支付提供了暂时的救济，但对多边机构和私人债权人的偿债支付仍然存在。该倡议于 2021 年 12 月到期。

图 2 自 2010 年以来，非洲国家每年的偿债支出已翻了两番



来源：《国际债务统计 2022》，世界银行，2022 年 4 月，<https://openknowledge.worldbank.org/handle/10986/36289>。

它的后继者 G20 债务处理共同框架超越了 DSSI，旨在为面临债务挑战的国家提供一个更全面的解决方案。但迄今为止，只有三个国家提出了申请。在这之后，这三个国家——乍得、埃塞俄比亚和赞比亚——没有得到任何减免。各国在申请该倡议时面临被信用评级机构降级的风险。

来自多边体系的一个有意义的经济支持领域，即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特别提款权（SDR），已经有了一些缓慢的进展。作为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储备资产，特别提款权是为了在危机时期提供流动性。它们可以用来支付债务，也可以兑换成硬通货以支持预算支出。2021 年 8 月 23 日，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董事会批准了一项总体分配。

由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规则，这些特别提款权是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持股比例来分配的。因此，虽然 4400 亿美元（68%）给了 G20 国家，但只有 330 亿美元（5%）给了非洲。因此，20 国集团同意了 1000 亿美元的目标，将特别提款权“回收”给弱势国家。在 2022 年 4 月，只有 360 亿美元被认捐。仅中国就认捐了这个数字的近三分之一。迄今为止，所认捐的特别提款权没有一个得到支付。

非洲国家对商品价格震荡的脆弱性加剧。例如，贝宁和尼日尔特别容易受到高食品价格的影响，食品净进口分别占私人消费的 15%和 7%。非洲的低收入国家有特别的风险：在 2007-2008 年和 2010-2011 年的食品价格冲击中，低收入国家的通货膨胀率增加了一倍多。

许多非洲国家的通货膨胀率已经很高，部分原因是与疫情有关的供应链冲击造成的。加纳 2022 年 1 月的总体通货膨胀率已经达到 13.9%，与食品有关的

通货膨胀率为 17.4%，阿克拉的区域通货膨胀率高于农村地区。在肯尼亚，2022 年 1 月的消费者通胀率为 5.39%。

有了必要的财政空间，政府可以通过社会保护措施来缓解对最脆弱人群的影响。在疫情期间，一些非洲国家的政府利用这一点取得了良好的效果，通过移动电话、工资单和其他方式向家庭转账。2020 年，塞内加尔政府向 100 万个弱势家庭发起了一项食品分配计划。

但所有这些都需要财政空间，而这种财政空间是短缺的。2020 年，非洲财政部长们提出了 1000 亿美元的刺激计划，以帮助他们抵御疫情的影响。从那时起，先进经济体国家提供了其 GDP 的 18% 的刺激措施，以保护他们自己的经济并囤积疫苗。非洲国家仍在等待这一刺激计划，但现在的需求规模更大，债务困扰和不稳定的风险也更大。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春季会议的议程

非洲国家显然需要不同规模的经济支持。在债务可持续性、粮食不安全和政治稳定方面的利害关系再明显不过了。

世界银行已经认识到这一挑战的规模，加强了一个新的、为期 15 个月的危机应对方案，大约为 1700 亿美元，并涵盖了 2022 年 4 月至 2023 年 6 月，以帮助各国应对乌克兰战争的影响，包括粮食不安全和大流行病的余波。

但是还有更多的工作需要做。因此，全球领导人和财长们最好通过以下行动迅速做出反应：

迅速提供 1000 亿美元特别提款权，以支持与疫情有关的反应和恢复。

● 这应该通过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减贫、增长信托以及复原力和可持续性信托来提供。

● 特别提款权也应通过世界银行和其他多边开发银行来提供。

● 提供一个全面的债务可持续性解决方案。

● 在国家申请共同框架时，提供所有债权人的债务停顿。

● 探讨并提供具体方案，让私人债权人参与进来，如贷款换债务政策或国内立法。

● 推动公布符合条件的债务减免，正如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利用其债务可持续性框架所估计的那样，以激励所有债权人和借款人的参与。

● 设定一个时间线，概述共同框架下的处理过程，以促进问责制和快速解决。

● 支持借款国为其利益进行有效谈判。

● 指导多边开发银行最大限度地利用其资产负债表。

- 世界银行和其他多边开发银行应利用其 AAA 信用评级，在资本市场上借入更多资金，为弱势国家提供多达 1 万亿美元的增量贷款。

本文原题为“[How the IMF and World Bank Can Support African Economies Hit Hard by Russia’s Invasion of Ukraine](#)”。本文作者 David McNair 是 ONE.org 的执行董事。本文于 2022 年 4 月刊于 Carnegie 官网。[单击此处可以访问原文链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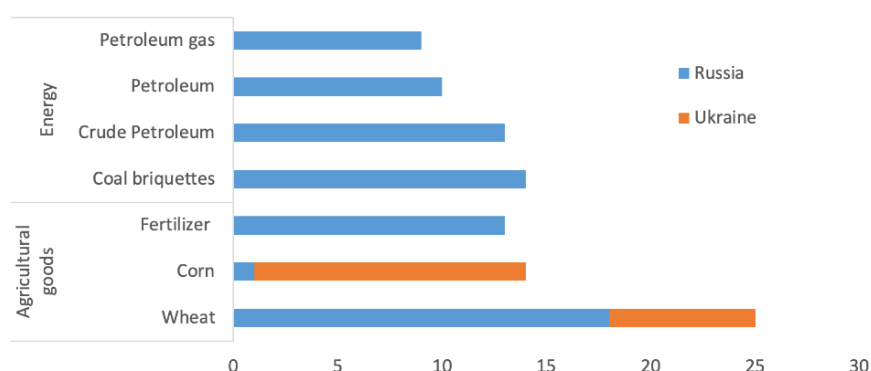
农产品和能源依赖进口的发展中国家受俄乌战争的影响最大

Maksym Chepeliev, Maryla Maliszewska, Maria Filipa Seara e Pereira/文 薛懿/编译

导读：俄乌战争正在扰乱全球基本商品的供应，推高价格，减缓贸易并降低收入。本文认为，在发展中国家里，农业和能源进口大国受到的打击最为严重。虽然一些大宗商品出口国可能会增加出口以从不断上涨的全球价格中受益，但它们可能会经历贸易模式的重组，导致与全球价值链的融合度降低。世界各地的消费者情况更糟，最贫穷的人受到的不利影响最大。编译如下：

俄乌战争正在扰乱全球基本商品的供应，推高价格，减缓贸易并降低收入。俄罗斯和乌克兰合计约占全球小麦出口的四分之一和玉米出货量的 14%（图 1）。乌克兰的葵花籽油产量占全球的一半，而俄罗斯是世界上最重要的能源供应国之一。由于黑海地区也是化肥出口大国，由此产生的短缺和价格上涨可能会对许多地区的作物产量产生负面影响（粮农组织，2022 年）。

图 1 2019 年俄罗斯和乌克兰在全球主要大宗商品出口中的份额（%）



数据来源：UN Comtrade。

高度依赖粮食和能源进口的发展中国家最为脆弱。例如，尼加拉瓜、刚果共和国和埃及分别有 89%、67%和 46%的小麦来自俄罗斯和乌克兰。阿尔及利亚的煤炭和吉尔吉斯斯坦的天然气都有 94%来自俄罗斯。

大型能源和农业出口国可能会受益于商品供应的中断，在一定程度上抵消乌克兰和俄罗斯的出口下降。但俄乌冲突还将导致全球价值链（Global Value Chains, GVC）的重塑。但哪些国家会受到的影响最大？谁将从冲突中受益？冲突将如何影响全球贸易和生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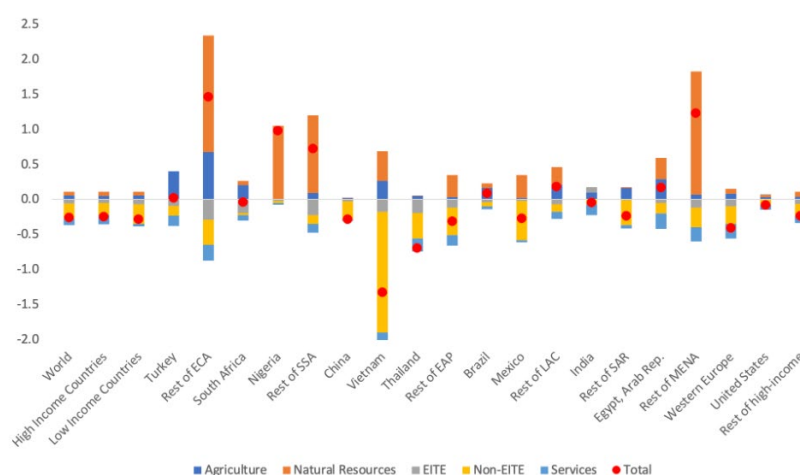
在新论文（Chepeliev et al. 2022a）中，我们试图回答这些问题。遵循 Chepeliev 等的方法（2022b），我们将最先进的全球模型 ENVISAGE（van der Mensbrugge 2019）与 GTAP 多区域输入-输出数据库（Carrico et al. 2020）相结合。我们进一步模拟了冲突对农业和能源市场造成的破坏，以及由此产生的针对俄罗斯的选择性制裁。

食品和能源价格冲击减少了全球贸易，但有利于部分出口商。

虽然模拟的中断使全球贸易量占 GDP 的比重降低了约 1%或 0.3%，但大宗商品价格上涨激励了某些出口商扩大生产并部分取代黑海地区的出口（图 2）。西欧以及欧洲和中亚（the Europe and Central Asia, ECA）地区、美国和印度的小麦出口增幅最大。土耳其、中国、巴西、印度和美国的其他作物（小麦的近似替代品）出口量也有所增加。中东和北非（the Middle East and North Africa, MENA）、ECA、撒哈拉以南非洲（sub-Saharan Africa, SSA）以及拉丁美洲和加勒比（Latin America and Caribbean, LAC）地区的大型化石燃料生产商的出口增长幅度更大（图 2）。

随着能源价格上涨，能源密集型和贸易暴露型（energy-intensive and trade-exposed, EITE）商品的生产变得更加昂贵，导致全球出口下降约 1%。由于食品、能源和运输的需求相当缺乏弹性，消费开始转向这些方面，非能源密集型制造业和服务业的出口也随之下降（图 2）。

图 2 参考年份出口/实际 GDP 的变化（%）



数据来源：使用 ENVISAGE 模型估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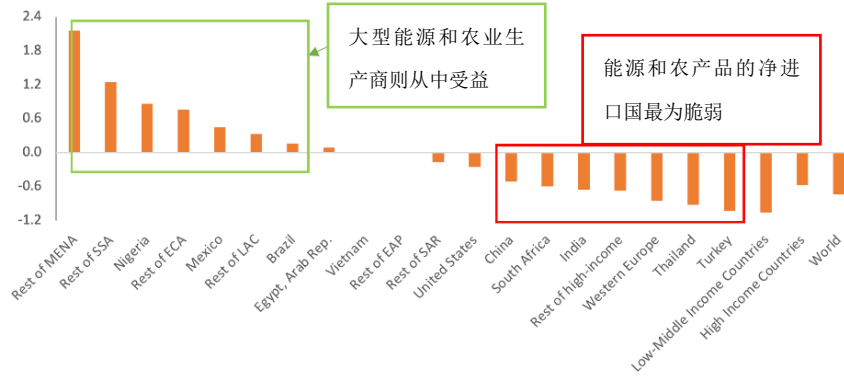
赢家和输家

由于供应中断和商品价格上涨，全球收入下降 0.7%，其中低收入和中等收入国家下降 1%，而高收入国家下降 0.6%（图 3）。平均而言，收入减少的一半来自能源价格上涨，而另一半则来自制裁和农业供应中断。这两个渠道的贡献度因地区而异。在高收入国家，收入减少主要是由能源价格上涨推动的，而对于低收入和中等收入国家来说，收入降低主要与食品价格飙升有关。

结果还表明，能源和农产品的净进口国遭受的损失最大，其中土耳其的实际收入下降了 1%，泰国下降了 0.9%，印度和南非都下降了 0.6%（图 3）。大型能源和农业生产商则从中受益，并可以看到收入增加，其中中东和北非位居榜首（图 3）。这是能源价格上涨和取代黑海地区供应商共同作用的结果。第

一条机制尤为重要，因为在撰写本文时，欧佩克国家尚未宣布任何扩大供应的计划。尼日利亚和墨西哥等其他能源净出口国的实际收入也有所增加（图 3）。

图 3 部分国家和地区实际收入变化（%）



数据来源：使用 ENVISAGE 模型估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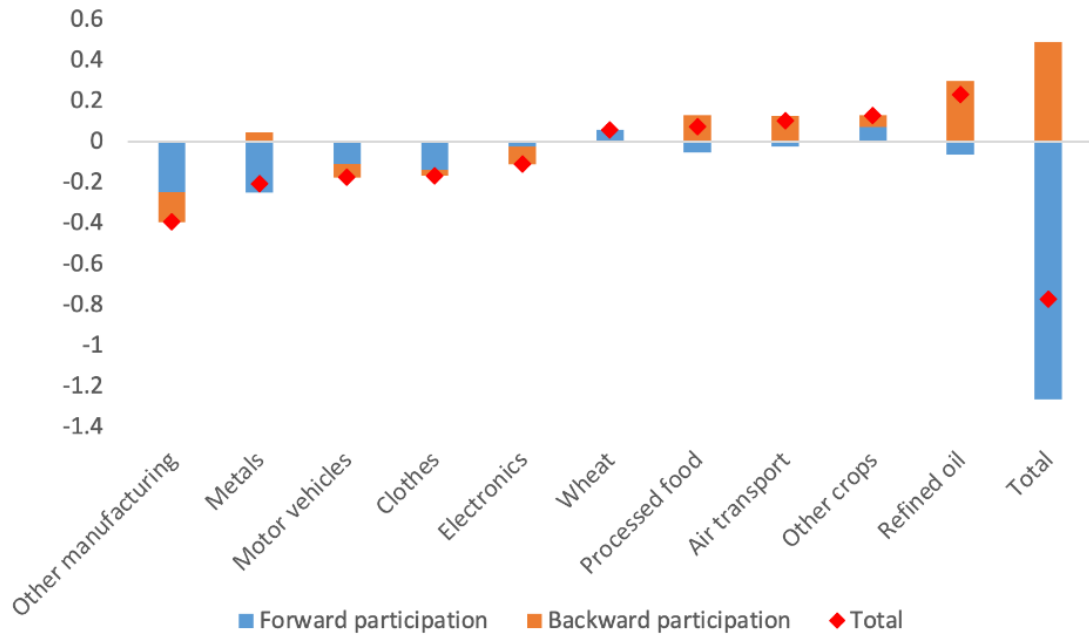
在大宗商品价格上涨的基础之上，农作物和能源成本的上升将带来额外的压力，尤其是对发展中国家最贫困的家庭而言（Artuc et al. 2022）。最低收入的家庭平均将 54% 的消费支出用于食品，7% 用于能源，4% 用于交通。

高附加值的制造业产品融入全球价值链的程度降低

农业和化石燃料价格不断上涨可能导致全球价值链的重大重组（Korn and Stemmler 2022）。消费者在食品和能源上花费更多，而对不太重要但价值更高的制造业商品的需求减少。这一趋势也反映在贸易流动的重组中——从价值角度来看，农业和能源商品在全球贸易中的份额增加，而轻工业的份额下降。这种组合效应意味着计算机、电子产品和运输设备的生产商融入全球价值链的程度较低，在许多情况下会导致这些国家的全球价值链参与率总体下降。

后一种趋势甚至出现在欧洲和中亚等一些大宗商品丰富的出口国（图 4）。虽然该地区的农产品和能源商品出口扩大，相应部门更多地参与全球价值链，但与高价值的制造业产品相比，它们的初始参与率相对较低。对于高价值和全球价值链融入度更高的商品，其全球价值链参与率的下降，超过了能源和农业贸易的上升，这意味着该地区在全球价值链中的整体融合度下降（图 4）。俄乌冲突结束后，估计的贸易再分配效应是否会保持强劲，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扭曲的持续时间（Korn and Stemmler 2022）。

图 4 欧洲和中亚部分行业参与全球价值链的变化（百分点）



注：前向联系全球价值链=第三国出口中体现的国内增加值（占出口的百分比）。后向联系全球价值链=出口中的进口投入（占出口的百分比）。

数据来源：作者使用 Envisage 模型估计。

政策影响

乌克兰战争对乌克兰人民来说是一场可怕的人间悲剧。它还对世界经济产生了重大影响。在本文中，我们指出，由于大宗商品价格急剧上涨，发展中国家当中的农业和能源净进口国尤其脆弱。为了减轻战争的潜在长期后果，应该考虑一下几个政策步骤。

首先，战争对社会经济不利影响的程度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未来的动态和冲突的持续时间。扩大制裁将有助于增加对俄罗斯的经济压力。引入能源进口禁令（Chepeliev et al. 2022c）和对俄罗斯资本货物的禁运（van Bergeijk 2022）可以达到这样的目的。

第二，即使不立即引入能源进口禁令，也应实施旨在减少化石燃料使用和促进能源替代品使用的需求侧政策措施（Bachmann et al. 2022）。比如通过补贴激励转向电动汽车（Arezki and Nysveen 2022）。

第三，随着食品价格的快速上涨，一些国家可能会考虑实施农产品贸易限制以保护国内消费者。政府应避免此类行为，因为它们可能会进一步危及全球粮食安全（Ruta et al. 2022）。

最后，俄乌战争已经给发展中国家的低收入家庭带来了巨大压力，因为他们将大部分预算用于食品和能源。通过有针对性的支持措施（例如直接一次性付款）来缓冲对贫困家庭的影响，是减轻最弱势群体负担的关键步骤。

本文原题为“*Agricultural and Energy importers in the Developing World are Hit Hardest by the Ukraine War’s Economic Fallout*”。本文作者 Maksym Chepeliev 是普渡大学全球贸易分析中心的研究经济学家，主要研究全球和区域经济问题。Maryla Maliszewska 是世界银行贸易和区域一体化部门的高级经济学家，尤其关注贸易对贫困和收入分配的影响。Maria Filipa Seara e Pereira 是世界银行贸易和区域一体化部门的顾问，研究方向是国际贸易和国际发展。本文于 2022 年 5 月刊于 VOX 官网。[单击此处可以访问原文链接。](#)

补充营养援助计划参与者与新型冠状病毒大流行初期的高度食物不安全

Sameer M. Siddiqi, Jonathan Cantor, Madhumita Ghosh Dastidar 等/文 宋海锐/编译

导读：新型冠状病毒大流行使生活贫困的家庭，尤其是黑人和拉丁美洲家庭承受了不成比例的压力。食物不安全是大流行的一个关键后果，它意味着获得足够数量营养食品的机会变得有限或不确定。我们研究了参加补充营养援助计划（SNAP）的人是如何受到大流行的影响的，尤其是黑人参与者和居住在食物荒漠的参与者。编译如下：

摘要

目的：新型冠状病毒大流行使生活贫困的家庭，尤其是黑人和拉丁美洲家庭承受了不成比例的压力。粮食不安全是大流行的一个关键后果，它意味着获得足够数量营养食品的机会变得有限或不确定。我们研究了参加补充营养援助计划（SNAP）的人是如何受到大流行的影响的，尤其是黑人参与者和居住在食物荒漠的参与者。

方法：本文使用来自一组纵向队列研究的调查数据，该研究主要针对居住在宾夕法尼亚州匹兹堡的城市粮食荒漠中的 18 岁以上的低收入成年黑人，我们研究了冠状病毒疾病之前（2018 年）和冠状病毒疾病大流行早期（2020 年 3 月至 5 月）的粮食不安全和 SNAP 参与的变化。我们通过协变量调整逻辑回归对 2018 年至 2020 年粮食不安全的变化进行了建模。

结果：从 2018 年到 2020 年，参加 SNAP 和调查的参与者粮食不安全感显著增加（从 2018 年的 25.9% 增加到 2020 年的 46.9%； $P < 0.001$ ）。与在这两个时间点均未加入 SNAP 的参与者相比，2018 年和 2020 年加入 SNAP 的参与者在 2020 年使用食物库的比率最高（44.4%），在 2020 年面临新的食物不安全感（28.9%）（即，他们在 2020 年面临食物不安全但在 2018 年并没有）。

结论：在冠状病毒疾病大流行期间，在 SNAP 登记并居住在粮食荒漠的低收入黑人家庭中，粮食不安全状况有所增加。公共卫生恢复工作的重点可能是调整 SNAP，以改善贫困人口的食物安全问题。

关键词：食品安全、冠状病毒疾病、补充营养援助计划、种族/民族差异、营养

冠状病毒疾病大流行的经济影响对家庭财务造成了前所未有的压力，进而对食品采购造成了压力。2020 年 12 月的人口普查数据表明，超过 14% 的美国家庭、24% 的黑人家庭和 21% 的拉丁裔家庭仍在为购买食品而努力。这些困难超过了大流行前的粮食不安全水平（即，获得足够数量的、负担得起的营养食

品的机会有限或存在不确定性），这在 2019 年影响了约 10.5%（1370 万）的美国家庭。

这些变化可能是由于企业倒闭导致的失业和收入减少。贫困人口（即生活在“联邦贫困线”附近的人口，2020 年一个 4 口之家的贫困线为 26200 美元）、已经没有粮食保障的家庭、有子女的家庭以及黑人和拉丁美洲家庭大量受到冠状病毒疾病发病率、死亡率和与流行病相关的收入损失的影响。

大流行期间的一项全国性调查发现，黑人（42%）和拉美裔（40%）家庭比白人（27%）家庭的食物不安全感更高。这些发现与以往经济衰退的研究结果一致，这些研究表明，有色人种低收入工人的受经济衰退影响更为严重。粮食不安全既是与大流行相关的一个关键后果，也是造成不良身心健康后果的一个重要风险因素。即使在冠状病毒疾病大流行之前，那些收入低于联邦贫困线 185%的家庭，其粮食不安全的可能性（27.6%）几乎是美国所有家庭的两倍（10.5%），非西班牙裔黑人家庭粮食不安全的可能性（19.1%）是非西班牙裔白人家庭的两倍以上（7.9%）。

相关报道表明，对于那些在居住在健康、可负担的食品有限的社区（即食物荒漠）的家庭，冠状病毒疾病相关的食品不安全尤为严重。例如，居住在粮食荒漠中的人可能无法使用个人车辆，因此可能特别容易受到与流行病有关的公共交通中断的影响。这些因素可能导致粮食荒漠居民在大流行期间更加缺乏粮食安全。然而，据我们所知，目前没有任何研究集中在这些社区里已登记美国农业部（USDA）补充营养援助计划（SNAP）的家庭。

SNAP 是美国最大的国内食品和营养计划。其目的是提供营养福利，以补充美国经济困难人群的粮食预算；在困难时期，它还起着经济稳定器的作用。SNAP 在改善粮食安全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这意味着必须随时可获得足够的粮食，以维持积极健康的生活。2020 年 4 月，美国有 4290 万人参加了该计划。在冠状病毒疾病大流行期间，SNAP 在为特别易受粮食不安全和经济困境影响的人群提供额外福利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

由于冠状病毒疾病大流行，美国农业部允许各州暂停某些注册和重新认证要求（例如，对新 SNAP 参与者的采访）；允许管理流行病-电子福利转移（P-EBT），也就是允许为有资格享受免费或低价学校午餐的学龄儿童和托儿中心的儿童提供补充福利；并允许将 SNAP 福利兑换为在线货物。尽管冠状病毒疾病病例数量增加导致当地反复出现封锁，但其中一些变化将于 2021 夏季和秋季到期。

此外，有证据表明，相对于低成本膳食的平均价格、以及冠状病毒疾病相关的失业和工资损失导致的经济困难增加、冠状病毒疾病相关的消费食品价格

上涨等，现有的福利水平可能不足。决策者和公共卫生官员要求准确估计粮食荒漠中 SNAP 参与者的粮食不安全状况，以确定应对这一流行病应实施哪些政策变化。

我们使用的纵向数据来自于宾夕法尼亚州匹兹堡市的 2 个城市粮食荒漠中居住的一组具有社区代表性的黑人家庭。我们通过观察 SNAP 参与者在冠状病毒疾病大流行之前和早期的粮食不安全和获得粮食的情况变化。我们对于生活在或接近联邦贫困指导线的黑人家庭粮食不安全问题的关注，可能有助于制定干预措施，以应对冠状病毒疾病大流行对这些家庭造成的不成比例的经济影响。

方法

这项匹兹堡山/霍姆伍德社区变化与健康研究（PHRESH）是一项纵向研究，于 2011 年启动，聚焦于从匹兹堡两个以低收入、以黑人为主要群体的食物荒漠社区的完整住宅地址列表中随机抽取的具有地理代表性的家庭样本。该队列由家庭中主要的成人食品购买者组成。PHRESH 研究旨在探索社区公共投入如何影响社区人口的健康。从 2020 年 3 月 23 日至 5 月 22 日，我们进行了一项电话调查，以观察冠状病毒疾病对我们队列中人群的影响。我们使用 2018 年期间收集的调查数据作为冠状病毒疾病前期的基准线；并进行了这项基线的面对面调查。

由于冠状病毒疾病，我们在 2020 年 3 月将调查方式从面对面改为电话。我们通过电话进行人员招聘和数据收集，我们向无法通过电话联系到的家庭发送明信片，以提高回复率。2020 年，我们在参与 2018 年数据收集的 855 名受访者中接触到了 605 名（回复率为 71%）。在 250 名没有参与的人中，163 人我们无法接触到，69 人拒绝参与，18 人自 2018 年以来经历了认知下降，无法参与调查。受访者和无应答者在大多数人口和经济因素上相似，但没有显著差异：受访者的收入高于无应答者，并且比无应答者报告家中有孩子的可能性更小。这项研究得到兰德公司机构审查委员会的批准。

SNAP 参与情况

2018 年和 2020 年调查中我们均收集了 SNAP 参与情况的数据。2018 年的调查问道：“在过去的 12 个月中，您的家庭成员是否接受过补充营养援助计划或 SNAP（以前称为食品券）？”。在 2020 年的调查中，我们问：“您的家庭成员目前是否正在接受 SNAP？”。根据这两个问题的答案，我们定义了 4 个类别。

第一，“2018 年和 2020 年加入 SNAP”包括在两次调查（2018 年和 2020 年）时加入 SNAP 的参与者。第二，“2020 年加入 SNAP 但不是 2018 年”包括 2020 年接受调查时加入 SNAP 但 2018 年并没有加入的参与者。第三，“2018 年登记但非 2020 年”包括 2018 年调查时登记在 SNAP 但 2020 年并没有

的参与者。第四，“2018年或2020年未注册”包括2018年或2020年接受调查时均未注册 SNAP 的参与者。

食品安全和紧急食品援助的使用

我们使用已验证的成人食品安全调查模块六项简表评估了 2018 年和 2020 年的食品安全。我们根据调查模块得分创建了一个三级食品安全衡量标准：我们将得分在 0 到 1.0 之间的人归类为食品安全，得分在 2.0 到 4.0 之间的人归类为食品安全水平较低的人，得分在 5.0 到 6.0 之间的人归类为食品安全水平极低的人。我们的分数基于对调查模块中 6 个问题的肯定回答数。

我们还使用标准截止值生成了一个二分法的粮食安全衡量标准；我们将得分在 0 到 1.0 之间的人归类为食品安全，得分在 2.0 到 6.0 之间的人归类为食品不安全。新的粮食不安全家庭是指 2018 年粮食安全但 2020 年粮食不安全的家庭。为了描述食物库的使用情况，我们问道：“在过去的 30 天里，你或你家里的任何人是否从食品储藏室、食物库、教堂或其他帮助提供免费食物的地方获得了免费食品？”。我们使用以下三个问题评估了冠状病毒疾病大流行期间获得食物的困难性：“自从冠状病毒爆发以来，你能获得食物吗？”；“自从冠状病毒爆发以来，你要支付食物、住房、医疗或药品等基本费用的难度有多大？”；还有“你认为你目前最担心的财务问题是什么？”。

样本特征

我们评估了 2018 年基线时的样本特征。为了实现本研究的目的，我们使用美国人口普查类别通过自我认同来定义种族。我们还评估了年龄、性别（男性/女性）、家中是否有孩子（是/否）、婚姻状况（已婚/同居或未婚/同居）、2017 年的家庭收入（基于 11 个收入类别）、SNAP 参与群体和年龄之间的教育程度（ $t < 0.05$ ），我们使用 Wald F 检验进行连续测量，Pearson χ^2 检验进行分类测量。同样，我们进行了 t 检验和 Pearson χ^2 检验，以确定 2018 年全样本中受访者和无应答者之间的显著差异（ $P < 0.05$ ）。其次，我们通过 SNAP 参与类别考察了 2018 年至 2020 年期间粮食安全的变化。

在单独的逻辑回归模型中，我们考察了 2018 年和 2020 年的粮食不安全状况，并对邻里关系、年龄、性别、种族、家庭收入、教育程度、婚姻状况、家庭中是否有孩子、2018 年的基本健康状况以及 2020 年大流行前的就业情况进行了调整。对于每个 SNAP 参与类别，我们描述了 2018 年和 2020 年的粮食不安全率以及 95% 的 CIs，并根据人口和经济因素进行了调整。2020 年，我们使用 SAS 9.4 版（SAS Institute, Inc.）进行了分析。由于缺少一些值（ $n=7$ ），分析样本量为 598。

结果总体样本以黑人（62.0%）和女性（83.8%）为主；平均年龄（SD）为 62.0（14.0）岁（表 1）。近一半的受访者在 2018 年和 2020 年都参加了 SNAP（45.2%）。2018 年或 2020 年的 SNAP 参与与未结婚/与伴侣同居（ $P<0.001$ ）、家中有孩子（ $P<0.03$ ）、租房（ $P<0.001$ ）、无法使用车辆（ $P<0.001$ ）以及在大流行开始时就业（ $P<0.001$ ）呈正相关且显著相关；参与度也随着年龄（ $P<0.001$ ）、家庭收入（ $P<0.001$ ）和教育程度（ $P<0.001$ ）的下降而增加。

SNAP 状态下的粮食安全和金融挑战

在 2018 年和 2020 年的 SNAP 调查中，近一半（47.8%）的受访者在 2020 年调查时都是食品不安全的（表 2）。这两年都参加 SNAP 的受访者新增食物不安全的比例最高（28.9%）（即 2020 年食物不安全，但 2018 年没有），且使用食物库的比例最高（44.4%）。在 4 个 SNAP 参与类别中，两年都参加 SNAP 的受访者也最有可能报告他们最大的财务问题是食品（30.5%）。

两个年份中均在 SNAP 登记的受访者和在 2018 年登记但不在 2020 年登记的受访者也最有可能报告无法获得他们所需的所有食物（分别为 30.0%和 30.9%）。在这两年参加 SNAP 的受访者中，23.1%的人表示，自冠状病毒疾病以来，支付基本医疗费用变得非常困难，而在 2018 年或 2020 年未参加 SNAP 的受访者中，只有 9.9%的人报告了同样的情况。我们发现，4 个 SNAP 参与类别在粮食不安全（ $P<0.001$ ）、获得粮食的能力（ $P=0.01$ ）、粮食银行使用（ $P<0.001$ ）、最大的财务问题（ $P<0.001$ ）和支付基本生活费用的能力（ $P<0.001$ ）方面存在显著差异。

表 1 宾夕法尼亚州匹兹堡市 2018 年和 2020 年 3 月至 5 月冠状病毒疾病大流行早期的研究参与者的 SNAP 参与状态特征

特征	整体 (N = 598)	2018年或2020年 均未登记 ^b (n = 232)	2018年登记 ^c 2020年未登记 ^c (n = 55)	2020年登记 ^c 2018年未登记 ^d (n = 41)	2018年和2020年 均登记 ^e (n = 270)	P value ^f
样本比例, %	100.0	38.8	9.2	6.8	45.2	—
		人口统计学 ^g				
年龄, 均值 (SD), y	62.0 (14.0)	64.5 (13.9)	55.7 (14.9)	63.1 (11.0)	61.0 (13.8)	<.001
性别						.11
男	97 (16.2)	46 (19.8)	11 (20.0)	7 (17.1)	33 (12.2)	
女	501 (83.8)	186 (80.2)	44 (80.0)	34 (82.9)	237 (87.8)	
种族						.63
黑人或非裔美国人	537 (90.6)	210 (91.3)	52 (94.5)	38 (92.7)	237 (88.8)	
其他 ^h	56 (9.4)	20 (8.7)	3 (5.5)	3 (7.3)	30 (11.2)	
家庭组成						
已婚/同居	99 (16.6)	62 (26.7)	6 (10.9)	2 (4.9)	29 (10.7)	<.001
家有儿童	113 (18.9)	35 (15.1)	18 (32.7)	7 (17.1)	53 (19.6)	.03
2017年全部家庭收入, 以千计, 均值 (SD), \$	23.2 (20.7)	社会经济 ^g				<.001
		36.5 (23.6)	19.3 (13.8)	19.9 (15.9)	13.0 (11.9)	
教育						<.001
<高中文凭	63 (10.5)	9 (3.9)	3 (5.5)	8 (19.5)	43 (15.9)	
高中文凭	213 (35.6)	66 (28.5)	18 (32.7)	11 (26.8)	118 (43.7)	
大学未毕业或技校	234 (39.1)	103 (44.4)	23 (41.8)	19 (46.3)	89 (33.0)	
大学/研究生文凭	88 (14.7)	54 (23.3)	11 (20.0)	3 (7.3)	20 (7.4)	
社区						.054
Hill地区	377 (63.0)	157 (67.7)	32 (58.2)	23 (56.1)	165 (61.1)	
Hoonwood	173 (28.9)	66 (28.5)	18 (32.7)	11 (26.8)	78 (28.9)	
其他	48 (8.0)	9 (3.9)	5 (9.1)	7 (17.1)	27 (10.0)	
租户	398 (66.6)	96 (41.4)	39 (70.9)	30 (73.2)	233 (86.3)	<.001
可获得车辆	385 (64.4)	192 (82.8)	27 (49.1)	28 (68.3)	138 (51.1)	<.001
		新冠肺炎病毒疾病相关 ⁱ				
在新冠肺炎病毒初期就业	235 (39.3)	125 (53.9)	31 (56.4)	11 (26.8)	68 (25.2)	<.001
严重的潜在健康问题 ^j	477 (79.8)	177 (76.3)	44 (80.0)	36 (87.8)	220 (81.5)	.28

缩写: COVID-19, 冠状病毒疾病; SNAP, 补充营养援助计划。

a.数据来源: 基于匹兹堡山/霍姆伍德社区变化和健康研究调查的计算。除非另有说明, 否则所有值均为数字(百分比)。并非所有参与者都回答了所有问题, 所以类别中的数字相加可能与列标题目中的数字不相等; 百分比基于回答问题的参与者人数。由于四舍五入, 百分比总和可能不会达到 100。

b.2018 年或 2020 年接受调查时, 未参加 SNAP 的参与者。

c.2018 年接受调查时, 参与者参加了 SNAP, 但 2020 年没有参加。

d.参与者在 2020 年接受调查时参加了 SNAP, 但在 2018 年没有参加。

e.两次调查(2018 年和 2020 年)时, 参与者都参加了 SNAP。

f.使用 Wald χ^2 检验进行连续测量(年龄和家庭收入), 使用 Pearson χ^2 检验进行分类测量(性别、种族、家庭构成、教育、邻居、租车者状况、车辆使用情况、就业状况和基本健康状况)。P<0.05 被认为是重要的。

g.基线评估(2018 年)。

h.其他种族和民族包括白人、亚洲人、美洲印第安人/阿拉斯加土著、夏威夷土著/其他太平洋岛民、多个种族和其他。

i.在 2020 年进行了评估。

j.肥胖、高血压、心脏病、肾病、糖尿病或高血糖、高胆固醇、关节炎或癌症。

表 2：2018 年和 2020 年 3 月至 5 月，在冠状病毒疾病大流行的早期阶段，通过宾夕法尼亚州匹兹堡市 SNAP 的参与状态分析粮食安全和获取粮食的情况

特征	整体 (N = 598)	2018年或2020年		2018年和2020年		P value ^f
		均未登记 ^d (n = 232)	2018年登记 ^c 2020年未登记 (n = 55)	2018年未登记 ^d (n = 41)	均登记 ^e (n = 270)	
2020年食物不安全 ^g	221 (37.0)	50 (21.6)	23 (41.8)	19 (46.3)	129 (47.8)	<.001
2020年低食物安全性	145 (24.2)	36 (15.5)	14 (25.5)	6 (14.6)	89 (33.0)	<.001
2020年极低食物安全性	76 (12.7)	14 (6.0)	9 (16.4)	13 (31.7)	40 (14.8)	<.001
2020年新面临食物不安全	137 (22.9)	35 (15.1)	14 (25.5)	10 (24.4)	78 (28.9)	.003
过去30天使用过食物库	215 (36.0)	57 (24.6)	21 (38.2)	17 (41.5)	120 (44.4)	<.001
自新冠肺炎病毒疾病以来获取食物的能力						.01
我可以相当容易获取需要的一些	282 (47.3)	131 (57.0)	24 (43.6)	20 (48.8)	107 (39.6)	
我可以获得需要的一切但困难极高	159 (26.7)	52 (22.6)	14 (25.5)	11 (26.8)	82 (30.4)	
我难以得到我需要的一切	155 (26.0)	47 (20.4)	17 (30.9)	10 (24.4)	81 (30.0)	
当前最大的财务担忧						.001
食物	135 (22.7)	32 (13.9)	13 (23.6)	8 (19.5)	82 (30.5)	
租金或抵押贷款	94 (15.8)	34 (14.8)	11 (20.0)	4 (9.8)	45 (16.7)	
医疗账单或药物	33 (5.6)	16 (7.0)	4 (7.3)	3 (7.3)	10 (3.7)	
公用事业	98 (16.5)	35 (15.2)	6 (10.9)	9 (22.0)	48 (17.8)	
没有财务担忧	235 (39.5)	113 (49.1)	21 (38.2)	17 (41.5)	84 (31.2)	
新冠肺炎病毒疾病以来基础生活开支难度						<.001
一点都不困难	262 (44.0)	124 (53.4)	18 (32.7)	17 (41.5)	103 (38.4)	
有些困难	219 (36.7)	85 (36.6)	16 (29.1)	15 (36.6)	103 (38.4)	
非常困难	115 (19.3)	23 (9.9)	21 (38.2)	9 (22.0)	62 (23.1)	

缩写：COVID-19, 冠状病毒疾病；SNAP, 补充营养援助计划。

a.数据来源：基于匹兹堡山/霍姆伍德社区变化和健康研究调查的计算。除非另有说明，否则所有值均为数字（百分比）。并非所有参与者都回答了所有问题，所以类别中的数字相加可能不等于列标题中的数字；百分比基于回答问题的参与者人数。由于四舍五入，百分比总和可能不会达到 100。

b.2018 年或 2020 年接受调查时，未参加 SNAP 的参与者。

c.2018 年接受调查时，参与者参加了 SNAP，但 2020 年没有参加。

d.参与者在 2020 年接受调查时参加了 SNAP，但在 2018 年没有参加。

e.两次调查（2018 年和 2020 年）时，参与者都参加了 SNAP。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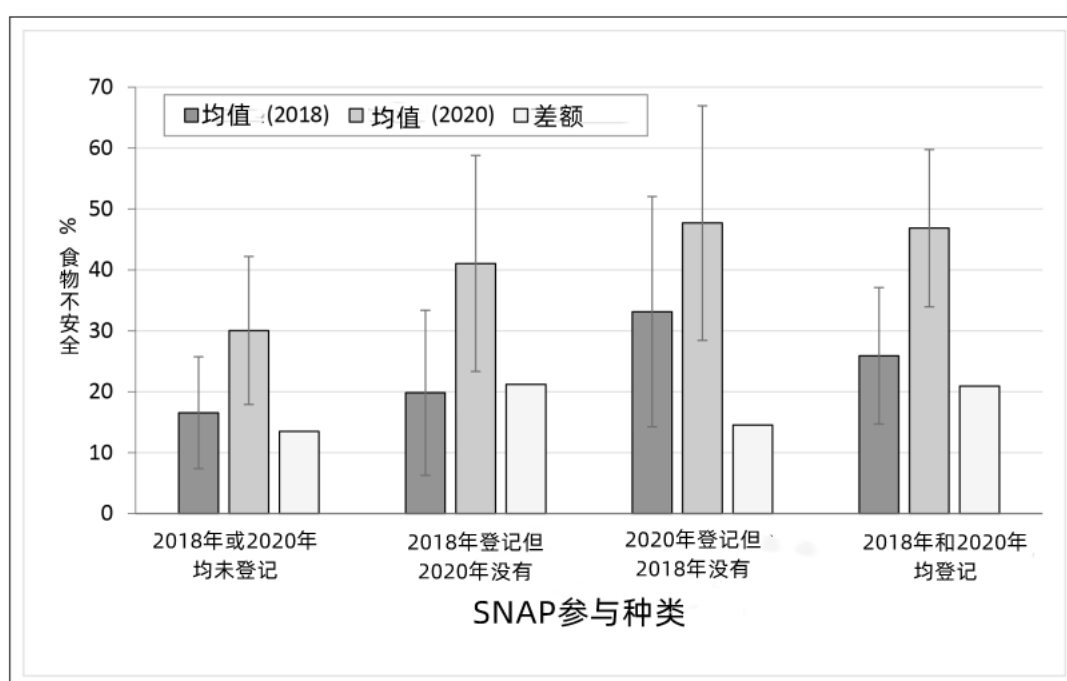
f.皮尔逊 x 2 检验用于确定所有变量的 P 值；P<0.05 被认为是重要的。

g.2020 年粮食不安全包括 2020 年粮食安全水平低或极低的家庭。食品安全的二分衡量标准来自美国农业部成人食品安全调查模块六项简表，该表使用标准截止值将食品安全调查模块得分为 0-1 的人归类为食品安全，得分为 2-6 的人归类为不安全，得分为 2-4 的人归类为低食品安全，得分为 5-6 的人归类为极低食品安全。分数基于对调查模块中 6 个问题的肯定回答数。2020 年对粮食不安全、财政问题、支付基本费用的能力和获得粮食的机会进行了评估。

SNAP 参与下的粮食安全变化

无论 SNAP 参与类别如何，从 2018 年到 2020 年，粮食不安全状况有所增加（下图）。我们发现，在 2018 年或 2020 年未参加 SNAP 的受访者中，粮食不安全感有所增加（从 2018 年的 16.6% 增加到 2020 年的 30.1%； $P=0.004$ ），2018 年参加 SNAP 但未参加 2020 年的受访者（从 19.8% 增加到 41.1%； $P=0.02$ ），2018 年和 2020 年参加 SNAP 的受访者（从 25.9% 增加到 46.9%； $P<0.001$ ），以及 2020 年参加 SNAP 但未参加 2018 年的受访者（从 33.2% 增加到 47.7%； $P=0.10$ ）。

图：宾夕法尼亚州匹兹堡冠状病毒疾病大流行早期，在 2018 年至 2020 年期间，按补充营养援助计划（SNAP）参与情况划分的粮食不安全差异。



“2018 年或 2020 年未登记”包括 2018 年或 2020 年接受调查时未登记 SNAP 的参与者；
 “2020 年登记但非 2018 年”包括 2020 年但非 2018 年调查时登记在 SNAP 的参与者；
 “2018 年登记但非 2020 年”包括 2018 年但非 2020 年调查时登记在 SNAP 的参与者；
 “2018 年和 2020 年报名”包括在两次调查（2018 年和 2020 年）时报名参加 SNAP 的参与者。误差条表示 95%CI。

数据来源：基于匹兹堡山/霍姆伍德社区变化和健康研究调查的计算

讨论

据我们所知，我们的研究是首次通过 SNAP 参与情况，在以黑人为主的人群中研究冠状病毒疾病对食物不安全的影响的纵向研究。我们的研究表明，在冠状病毒疾病大流行期间，在 SNAP 登记的居住在种族隔离粮食荒漠中的低收入黑人家庭特别容易受到粮食不安全的影响，并且在获取粮食方面遇到了巨

大的障碍，特别是与我们样本中没有参加 SNAP 的类似家庭以及全国代表性调查的结果相比。

我们发现，2018 年和 2020 年在 SNAP 中登记的研究对象在大流行的前几周有很大困难，46.9%的人食物不安全，而 2018 年或 2020 年未登记的研究对象中有 30.1%的人食物不安全。大量在 2018 年并非食物安全的家庭，在 2020 年变得食物不安全。加入 SNAP 的受访者与未加入 SNAP 的受访者之间在大流行期间粮食安全变化幅度上的差异，也可能与这些群体在易受经济或其他外部冲击影响方面存在更大的未观察到的差异有关，而这些外部冲击在我们的分析中并未得到控制。

此前的研究表明，食物准入壁垒在一定程度上是根深蒂固的收入不平等和邻里劣势的结果，这源于经济投资和发展政策中的结构性和体制性种族主义。我们研究中报告的经济困难可能归因于冠状病毒疾病疫情导致的企业倒闭下的失业和工资损失，这在黑人和拉丁美洲工人、女性和大学以下学历的人群中影响最为严重。

工资损失方面的种族/民族差异可能与流行病对低收入黑人和拉丁美洲人就业的行业类型（即受流行病影响最大的行业，包括食品服务和零售业）的不同影响有关，也可能与流行病期间对企业的经济援助差异有关（如工资支票保护计划贷款），以及在经济机会、工资和家庭储蓄方面长期存在的种族/民族差异。对于在 2020 年 4 月或 5 月对我们的调查作出回应的家庭来说，粮食不安全可能与消费者食品价格上涨后购买力下降有关，而这与 SNAP 或就业收入中的生活成本调整不匹配。

我们研究中报告的食物获取挑战可能与我们样本中的车辆拥有率低、匹兹堡的社会距离限制导致公共交通出行减少以及大流行前几周的存储时间、人员配备和库存减少有关，尤其是位于健康实惠食品供应有限的社区的小型食品零售店。这些差异也可能部分归因于结构性种族主义造成的食品供应差异。

例如，在一些以黑人为主的社区，获得健康且价格合理的食品的机会有限，这可能与植根于住宅和零售红线的发展政策有关，也可能与零售商和开发商对以黑人为主的社区的文化偏见、盈利能力或犯罪感知有关。

局限性

这项研究有几个局限性。首先，我们的结果可能不会推广到所有人群。相反，我们的研究结果与贫困黑人或生活在健康和负担得起的食物有限地区的黑人特别相关。其次，在我们的样本中，粮食不安全问题可能特别突出，因为家庭往往会在粮食最不安全的时候自我选择陷入困境。尽管我们对加入 SNAP 的家庭和未加入 SNAP 的家庭的比较根据人口和经济因素的差异进行了调整，但

我们没有考虑可能存在的其他差异。第三，我们对 SNAP 参与度的测量是自我报告的。据全国家庭食品收购和购买调查和 SNAP 管理记录估计，漏报是一个令人担忧的问题，可能高达 18%。第四，美国农业部的粮食安全模块可能低估了边际粮食安全（即粮食安全）对健康的不利影响。第五，我们的研究无法确定 2018 年至 2020 年 SNAP 参与状态变化的原因。最后，我们从 2020 年 3 月 23 日至 5 月 22 日进行了实地调查，这是一个粮食供应、SNAP 管理和经济援助政策快速波动的时期。

在数据收集期间，宾夕法尼亚州对 SNAP 进行了几次管理变更（例如，4 月底发放了紧急拨款）。这些变化可能影响了我们的发现；例如，发放紧急拨款可能改善了 SNAP 登记家庭的粮食安全。然而，在研究期间不太可能捕捉到这些政策变化的全部影响。截至 4 月中旬，我们大约 60% 的样本已经做出了回应，新闻媒体报道了宾夕法尼亚州实施 SNAP 福利的挑战和延迟。国家的数据表明，类似的延误在黑人和拉丁美洲社区尤其普遍，他们在获得与流行病有关的经济援助方面的机会不平等。

结论

我们的研究表明，鉴于在我们的研究中，近一半的 SNAP 参与者是食物不安全的，必须在近期和长期内做更多的工作来加强和有效利用 SNAP。为了解决 SNAP 接受者的短期财务障碍，国会最近将 SNAP 的最大收益提高了 15% 至 2021 年 6 月，同时扩大了大学生使用 SNAP 的机会，并为 SNAP 机构和食品银行分配了额外资金。同样，美国农业部最近增加了学龄儿童的 P-EBT 福利，并为最低收入家庭紧急拨款。

考虑到冠状病毒疾病大流行的长期经济影响，以及可能与公共卫生或经济指标相关，这些变化以及现有的豁免应该延长。各国还应考虑改善 P-EBT，该计划已延长至 2021 年 9 月。例如，州儿童营养和 SNAP 机构应考虑直接向家庭发放福利，并简化申请和福利激活。虽然我们的调查没有询问 P-EBT 收据，这是在我们的调查启动后才在宾夕法尼亚州获得批准的，但未来的研究应该寻求描述该政策的益处。

政策制定者还应考虑采取长期措施，以解决 SNAP 福利的充分性问题，包括调整节俭食品计划的基本假设。为解决 SNAP 准入障碍，决策者应考虑给予进一步的灵活性，允许 SNAP 福利用于从更多种类的商店以购买现成食品和在线货物，并允许抵扣送货费。政策制定者还应重新评估对工作要求规则、公共收费政策（即移民规则，如果人们获得了公共福利，就更难获得绿卡或临时签证）、基础广泛的分类资格和公用事业津贴的繁重修改，这些都可能加剧

SNAP 准入方面的不平等。对 SNAP 的快速投资可能会减轻贫困人群中冠状病毒疾病不成比例的负担。

本文原题为“SNAP Participants and High Levels of Food Insecurity in the Early Stages of the COVID-19 Pandemic”。本文作者 Sameer M. Siddiqi 就职于美国弗吉尼亚州阿灵顿兰德公司社会和经济福利部，Jonathan Cantor, Madhumita Ghosh Dastidar, Robin Beckman 均就职于美国加利福尼亚州圣莫尼卡兰德公司社会和经济福利司，Andrea S. Richardson, Matthew D. Baird, Tamara Dubowitz 均就职于美国宾夕法尼亚州匹兹堡兰德公司社会和经济福利司。本文于 2021 年 3 月发表于公共卫生报告（2021）。[单击此处可以访问原文链接。](#)

日本物价发展特征

Monetary Affairs Department, Bank of Japan/文 廖世伟/编译

导读：2022年3月29日，题为“日本物价发展特征”的“新冠肺炎疫情大流行期间物价发展问题”的第一次研讨会在日本银行总行举行。以新冠肺炎疫情后日本、美国和欧洲的消费者物价变化差异为切入点，经济学和实证分析领域的专家学者围绕日本物价变化特征展开了热烈的讨论。编译如下：

摘要

2022年3月29日，题为“日本物价发展特征”的“新冠肺炎疫情大流行期间物价发展问题”的第一次研讨会在日本银行总行举行。以新冠肺炎疫情后日本、美国和欧洲的消费者物价变化差异为切入点，经济学和实证分析领域的专家学者围绕日本物价变化特征展开了热烈的讨论。

第1场会议基于物价变化分布和核心通货膨胀指标的分析结果，重点讨论了与美国和欧洲相比，日本在新冠肺炎疫情大流行后消费者物价通胀较低的特点。此外，基于实证结果显示，在日本工资和物价之间的联系是薄弱的，讨论两者之间的关系，这在通货膨胀的可持续性方面很重要。第2场会议着重讨论了服务价格，这是造成日本、美国和欧洲消费价格发展差异的原因之一，并讨论了与服务价格衡量，特别是与租金有关的问题。有专家指出，新冠肺炎疫情爆发后，采用何种衡量方法可能会对日本和其他国家之间的通货膨胀率的衡量差异产生重大影响。

第3场会议由专家组讨论组成，重点讨论三个主要问题：（1）日本、美国和欧洲消费者物价发展差异的原因；（2）未来物价的预期；（3）基于物价现状和预期的货币政策面临的挑战。关于（1），专家们普遍认为，美国通货膨胀加速的主要原因包括需求的大幅回升和劳动力参与率的下降；相比之下，日本没有出现类似的情况，因此与美国相比，日本的消费者价格通胀仍然较弱。关于（2），有专家指出，一方面，由于疫情大流行之前就存在长期的通货紧缩因素和新冠肺炎疫情的影响，导致了需求下降，日本面临物价再次下跌的风险；另一方面，大宗商品价格大幅上涨引发的成本推动型冲击，也带来通货膨胀上升的风险。然后有专家指出，决定哪种风险更有可能发生的关键因素是工资的未来发展。关于（3），专家组成员都认为，继续放松货币政策以应对需求疲软是可取的，同时应该通过货币政策以外的措施应对某些商品的价格上涨，特别是能源价格。

1.引言

本文是 2022 年 3 月 29 日在日本银行总行举行的题为“日本物价发展特征”的“新冠肺炎疫情大流行期间物价发展问题”第一次研讨会的总结。研讨会首先由日本央行副行长雨宫正佳（Amamiya Masayoshi）致开幕词。在第 1 和第 2 场会议，日本银行货币事务部门的工作人员先作报告，然后由讨论者和现场与会者进行讨论。第 3 场会议是关于“新冠肺炎疫情后物价发展”的专家组讨论，随后由日本央行副行长若田部昌澄（Masazumi Wakatabe）发表闭幕词（流程见附录 1）。

以下是两个专题报告、专家组讨论和闭幕词的总结。³在研讨会举行时，所列单位是发言者目前的工作单位，文中省略了尊称发言者及其所在单位名单见附录 2）。清水诚一（Seiichi Shimizu）担任了整个研讨会的主持人。

2. 第 1 场会议：“近期日本通货膨胀的动态特征”

(1) 报告

在当天的报告中，一濑善孝（Yoshitaka Ichise）首先分析了新冠肺炎疫情大流行后日本消费者物价指数低于美国和欧洲的原因。然后，他用实证证明，在日本，从通货膨胀可持续性的角度来看，工资和物价之间的联系是很重要的，但这种联系是微弱的，并就这种微弱联系的原因提出了几个假设。

在分析新冠肺炎疫情大流行后的消费者物价发展时，他阐述了他对日本物价发展特征的看法，以及从商品层面的物价变化分布和核心通货膨胀指标中看到的潜在机制。具体而言，他指出，首先，在美国和欧洲，疫情爆发后的物价变化分布总体朝着物价上涨的方向转变，而日本几乎没有这种变化。其次，美国所有核心通货膨胀指标都有所上升，而在日本，显示物价变动幅度的众数值和加权中值几乎没有上升，经过调整的平均值也只是略有上升。基于这些发现，他认为，尽管日本的通货膨胀已经成为一种趋势，但到目前为止，与美国和欧洲相比，它在各种商品上的扩散是有限的，而且通货膨胀的增长一直是温和的。接下来，他展示了基于核心通货膨胀指标的分析结果，重点是与产出缺口和物价粘性的关系，来探究观察到变化的原因。他首先提到了“周期性指标”和“粘性指标”，前者汇总了与产出缺口和失业率高度相关的商品，后者汇总了价格不经常修正的粘性商品，它们在实证评估价格与商业周期和通货膨胀预期之间的关系方面非常有用。基于这一分析结果，他认为，新冠肺炎疫情大流行后，日本消费者物价指数较美国和欧洲低的原因是通货膨胀预期较低且稳定，以及产出缺口温和改善。

³ 有关开幕式致辞全文“2019 冠状病毒病危机和通货膨胀动态”，请参见：https://www.boj.or.jp/en/announcements/press/koen_2022/ko220329b.htm/

关于工资和物价的相互作用，他使用格兰杰因果检验和向量自回归模型来检验其在日本随时间的变化以及日本和美国之间的差异，然后强调了预测未来工资和物价发展的关键点。他认为日本的工资与物价之间的相互作用，无论是与日本过去的情况，还是与美国相比，都较弱，即使物价因受到冲击而上升，也不太可能通过工资上涨而导致物价累积上升。此外，他提出了一个假设，即日本工资与物价之间较弱的关系的一个原因是“理性忽视”，也就是说，由于物价上涨没有超过正常工资的上涨，个别家庭认为物价上涨不是生活成本的增加，因此可能不太注意物价。他指出，其他因素包括以妇女和老年人为主的劳动力弹性供应，以及劳动生产率增长的巨大空间。最后，他指出，预测未来工资和物价发展的关键是这些趋势是否有可能逆转。

(2) 讨论者的评论

参与讨论的盐路悦郎（Etsuro Shioji）评论说，通过使用适当的指标，并将重点放在经济活动和物价之间发挥中介作用的工资上，这份报告让人们对日本的低通货膨胀有了更准确的理解。他接着指出，在分析日本近年来的通货膨胀动态时，也有必要考虑供应方面的因素。他特别强调了分析能源价格发展的重要性，指出包括汽油在内的相关能源商品的价格可能会通过家庭对通货膨胀的感知影响通货膨胀预期，因为这些商品的购买频率很高。接下来，他指出，报告中关于“理性忽视”是物价到工资较弱传递的原因之一假设很有趣，他就“理性忽视”的作用提出了自己的观点。他指出，克服“理性忽视”意味着人们不需要关心通货膨胀的发展，从经济福利的角度来看，这可能是不可取的。最后，他指出，在衡量工资和物价之间的联系时，不妨通过检验可被视为边际成本的与工资有关的指标的发展情况，例如非全职和临时工人的工资以及非定期工作时间，来扩大分析的范围。

讨论者森川正之（Masayuki Morikawa）评论说，该报告提供了一个有用的分析，因为它清楚地表明，日本商品层面的物价变化分布和核心通货膨胀指标与美国和欧洲有显著差异，而且日本的工资和物价之间的联系已经减弱。此外，他就校验核心通货膨胀指数的方法和工资与物价之间的联系以及对分析结果的解释提出了以下意见。在核心通货膨胀指标方面，他指出，将商品分类为“粘性指标”和“周期性指标”的方法本身并没有捕捉到物价修正频率的变化，并询问为何日本和美国对商品进行了不同的分类。他还指出，用于校验工资和物价之间的联系的分析方法反映了相对短期的相互作用，在有些情况下，这种方法可能并不适合于表明中期至长期的结构关系。进一步，对于工资和物价之间的联系减弱的原因，他指出，即使物价下降，由于名义工资刚性下降，工资下降可能有限，而在宽松的货币政策下，工资下降并没有导致物价下降。最后，

像盐路（Shioji）一样，他表示在全球通货膨胀担忧加剧的阶段，如果消费者物价指数（CPI）在“理性忽视”的背景下稳定在接近零的水平，应该被视为一件好事。

（3）一般讨论

为了回应讨论者盐路（Shioji）关于供给方面的因素在日本通货膨胀动态中的重要性的评论，共同报告人川本卓司（Takuji Kawamoto）回应说，在核心指标方面，不包括能源和食品等对进口通货膨胀敏感的商品，可能会低估成本推动冲击的第二轮溢出效应。此外，他指出，为了确定基础物价的发展，不仅有必要研究以平衡的方式校验的商品层面的物价变化分布，而且需要调整指标均值和加权值等值，因为这些指标根据分布信息机械地消除了不正常的价格变动。此外，对于盐路（Shioji）和森川（Morikawa）两位讨论者给予正面评价的“理性忽视”，川本（Kawamoto）指出，这在某些方面与前美联储主席格林斯潘（Greenspan）对物价稳定的定义有关。他进一步指出，目前在美国，工人对通货膨胀的强烈兴趣造成了一个“工资-物价螺旋”上升，导致了通货膨胀，而在日本，自第二次石油危机以来就没有出现这种螺旋，这也是日本物价长期停滞的根本原因。最后，他指出，一方面，日本要摆脱零通货膨胀，就必须恢复工资和物价相互推动的机制；另一方面，在当前间歇性的全球供应冲击的情况下，如果工资价格螺旋上升的可能性变大，则存在通货膨胀预期可能变得不稳定的风险，央行可能难以将消费者价格通胀率稳定在接近其目标的水平。

针对讨论者盐路（Shioji）建议扩大分析范围，将兼职人员和临时工的工资纳入分析的评论，报告人一濑（Ichise）指出，虽然从理论角度来看这是正确的，但 2017 年至 2018 年兼职工资大幅增长，宏观基础角度分析的工资并未增长的事实，使得这种情况难以解释。此外，针对森川（Morikawa）询问的日本和美国某些商品在“粘性指标”和“周期性指标”中的不同分类的问题，他回答说，例如，在有管理的物价下，成本的变化，包括能源价格的上涨，很容易反映在美国的定价中，而在日本，因为补贴是常态，成本的增加没有充分反映在定价中。

植田和男（Kazuo Ueda）、小林庆一郎（Keiichiro Kobayashi）和福田慎一（Shin-ichi Fukuda）在发言中指出，有趣的是，这次演讲强调，消费物价的增长一直保持在正常工资增长的范围内，这是日本持续“理性忽视”的原因。植田（Ueda）接着强调零通货膨胀的经济福利成本，指出在“理性忽视”导致的零通货膨胀状态下，名义利率的有效下限没有足够的“缓冲”，可能使得相对价格的平稳调整受到阻碍。小林庆一郎（Kobayashi）重点关注消费者价格通货膨胀率低导致“理性忽视”并导致工资不上涨的因果循环，而工资增长率低导

致家庭对价格上涨的容忍度较低，从而导致价格通货膨胀率较低，并表示应更详细地研究这一循环。福田（Fukuda）指出，在工资调整中，固定工资增长占最大比重的一个重要原因是终身雇佣制的前提已经崩溃，工会强调雇用稳定性，而不是基本工资的增长。与此同时，渡边努（Tsutomu Watanabe）提到他自己使用微观数据的关于工资和物价之间的联系实证研究，指出尽管在公司层面没有发现工资变化和定价行为之间的关系，在家庭层面，对未来工资的预期影响了家庭对物价上涨的容忍度。最后，为了回应盐路（Shioji）的观点，龟田制作（Seisaku Kameda）说，由于能源价格高企，家庭对通货膨胀的看法和通货膨胀预期加剧，可能会通过消费的下行压力对物价产生抑制作用，他指出，对工资和收入预期的调查可能更有助于衡量家庭对物价上涨的容忍度。

3.第2场会议：“消费物价指数（CPI）中的服务价格：以租金为主”

（1）报告

报告人岩崎雄斗（Yuto Iwasaki）研究了服务物价，认为它是造成日本、美国和欧洲在现阶段消费物价发展差异的原因之一。他特别关注了租金，尤其是估算租金和手机费用，概述了这些服务商品的衡量问题。他指出，如果日本采用类似于美国和欧洲的衡量方法，日本的消费者价格通胀率将高于目前的水平。然而，他补充说，对这些商品的衡量方法没有国际共识，他并不一定建议在日本采用报告中使用的方法。

他首先强调，无论从理论和实践的角度衡量业主自住房成本都很困难，而且衡量标准是什么，不同国家之间的差异有多大？具体而言，他指出，虽然日本和美国采用了“租金等值法”，即业主自住房成本是基于出租物业的租金估算的，但美国使用的租金是根据老化恶化的情况进行调整的，而日本则没有调整。他接着表示，根据日本内务和通讯部（MIC）的估计，根据老化恶化的情况进行调整将使日本消费物价指数（CPI）的同比变动率提高 0.1 个百分点。他还指出，美国在衡量估算租金时排除了受租金管制的单位，而日本则没有考虑租金管制。在这方面，他指出，由于日本《土地和建筑租赁法》对现行租金（同一住户继续居住的房产的租金）施加了大量限制，租金呈刚性上升趋势，他建议，解决这个问题的一种方法是使用新合同租金（租户变更的房产租金）来衡量估算租金。他指出，这些估计数据表明，按照这种方法计算的消费者物价指数（CPI）同比变化率的增幅，平均而言将略高于根据老化恶化的情况进行调整时的增幅。

此外，他引入了“购置方法”作为“租金等值法”之外另外一种衡量自住房成本的方法，该方法未来将会在欧元区引入。他认为，这种方法更直接地反映了房价，它的优势包括可以构建一个更好地反映人们看法的指数，以及它不

太可能受到租赁市场结构性因素（包括监管）的影响。他表示，如果将这一方法应用于日本，就有可能将消费者物价指数（CPI）的同比变动率明显向上修正，尤其是在当前房价上涨的时期。

他还就手机话费，讨论了有关如何处理从 2021 年 4 月开始实行的“在线套餐”的问题。他首先介绍了日本内务和通讯部（MIC）从 2022 年 1 月开始，将现有保险和网上保险的认购人数纳入考虑范围的方法变更，并讨论了变更原因。然后，他表明，如果反映实际认购人数，在调整之前的 2021 年 4 月至 12 月期间，消费者物价指数（CPI）的同比变化率将明显更高。然而，他补充说，由于统计数据编制中的实际问题，反映实时权重可能很难。

（2）讨论者的评论

讨论者宇南山卓（Takashi Unayama）认为，租金和手机费用只能解释新冠肺炎疫情大流行后日本、美国 and 欧洲之间消费者价格通胀率差异的有限部分，并不是这些差异的主要原因。此外，他认为租金对美国通货膨胀压力的影响不应被视为新冠肺炎疫情的特征，由于租金在消费者物价指数（CPI）中所占比重较大，因此它在通货膨胀差异中所起的作用比在疫情期间租金上涨的加速更为重要。

他然后提到了报告中所提供的“租金等值法”的估计值，并表示他认为考虑到老化恶化的影响并不大。他还认为，日本现行租金的粘性与其说是由于《土地和建筑租赁法》，不如说是由于搬迁成本和其他因素，许多租户不管租金多少都会继续住在同一所房子里。关于“购置方法”，他认为这种方法目前在美国和欧洲没有使用，它不能解释日本、美国 and 欧洲之间的物价发展差异。

最后，在手机费用衡量方面，他指出，虽然基本物价指数理论建立在理性消费者成本最小化的假设基础上，但如何将消费者在实际操作中并不总是选择最低物价的指标纳入其中，是一个困难的挑战。

讨论者清水千弘（Chihiro Shimizu）评论说，报告提出的各种估计方法似乎是合理的，然后总结了最近国际上关于业主自住房成本衡量的讨论。

他首先指出，住房服务的衡量引起了国际关注，因为住房服务在消费者物价指数（CPI）中占很大权重，而且住房市场被视为资产和商品市场最重要的纽带。其次，他指出，“租金等值法”的困难在于房主自己不知道如果他们要出租房产的合适租金是多少。在他看来，关于该方法的实际问题涉及（1）质量变化的调整，（2）老化恶化的调整，以及（3）处理租金粘性。关于第三个租金粘性的问题，他指出，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其他国际组织目前正在修订的《消费物价指数手册》的理论部分，计划建议使用反映实际市场条件的租金，包括新的合同租金来衡量估算租金。

接下来他指出，鉴于上述实际问题，使用“租金等值法”对日本未必是可取的，他介绍了“机会成本法”作为另一种估计方法。在这种方法中，基于“租金等值法”估计的成本和基于“用户成本法”估计的成本中较大者被视为业主自用住房的机会成本，他认为这种方法弥补了“用户成本法”的实际缺陷，从理论角度来看，这被视为最可取的方法。此外，他表示，国际上正在为在实践中使用“机会成本法”奠定基础，包括进行了数据汇编。

(3) 一般讨论

为了回应由讨论者宇南山（Unayama）提出的，租金不是消费者物价通胀在日本和美国之间存在差异的主要原因在，报告人岩崎（Iwasaki）指出，从当前数据可以看出，租金在日本和美国总体指标之间的差异起到巨大影响。此外，考虑到一些专家认为，美国的租金将进一步上涨，未来与日本的通货膨胀差距可能进一步拉大。此外，关于租金的影响程度大小是由租金在消费者物价指数（CPI）中的权重造成的这样的评论，他指出，权重较大的商品相当重要，因为这些商品的测量误差更有可能影响整体指数。对于租金的高粘性不是因为《土地和建筑租赁法》，而是因为搬迁费用等因素的建议，他回答说，这些因素不会成为租金保持不变的原因。接下来，对于学者清水千弘（Chihiro Shimizu）提出的“机会成本法”，他认为，在理论上，如果业主自住和租赁市场之间存在完美套利，“用户成本法”和“租金等值法”的估计将会是一致的；然而，在实践中，因为套利不起作用，“用户成本法”和“租金等值法”的价值不同。他接着指出，关于“租金等值法”的可取性，还必须与不依赖租金市场数据的“用户成本法”进行比较。

在现场，若田部昌澄（Masazumi Wakatabe）询问了讨论者宇南山（Unayama）对报告人岩崎（Iwasaki）强调的日本房价与租金之间缺乏联系的看法。宇南山（Unayama）指出，虽然近年来房价是由原材料和劳动力成本的上涨推动的，但这些成本的增加可能并没有转嫁到租金上。他还指出，成本增加并没有转嫁到物价上，这一现象不仅见于租金，而且见于许多其他商品。植田（Ueda）补充说，从理论角度看，当风险溢价等都在下降时，房价上涨和租金下降是完全可能并存的。讨论者清水千弘（Chihiro Shimizu）认为，房价和租金之间缺乏联系的原因是业主自住市场和租赁市场的分割，他重申在这种分割下，使用“租金等值法”是不可取的。

虽然承认租金的测量有问题，渡边努（Tsutomu Watanabe）之后提出了一个问题，即在讨论日本物价的发展，可能更重要的是要注意实际的市场结构使得新合同和现行租金的租金价格修订概率极低。阵内了（Ryo Jinnai）指出理论上，如果现行租金因《土地和建筑租赁法》保持不变，那么很有可能考虑到这

一点，制定新的合同租金。虽然在这种情况下，新的合同租金很可能反映出人们的通货膨胀预期，但如果像渡边努（Tsutomu Watanabe）所指出的那样，新的合同租金实际上是刚性的，那么这是一个非常有趣的问题，应该加以探讨。作为对这些言论的回应，联合报告人黑住卓司（Takushi Kurozumi）指出，住房市场就像商品市场一样，家庭可能对物价上涨的容忍度较低，深化我们对住房市场结构的理解是十分重要的。

4. 专家组讨论：新冠肺炎疫情后的物价动态

主持人：青木浩介（Kosuke Aoki）（东京大学）

嘉宾：小林庆一郎（Kobayashi Keiichiro）（庆应大学）

渡边努（Watanabe Tsutomu）（东京大学）

内田真一（Shinichi Uchida）（日本银行）

4.1 专家组演讲

研讨会开始，专家组讨论的主持人青木浩介（Kosuke Aoki），请专家组成员就以下三点演讲：（1）他们对当前的物价发展的看法，也就是说，为什么新冠肺炎疫情后日本，美国和欧洲的消费者价格通胀率不同；（2）物价的未来预期，即日本的消费物价是否会像美国和欧洲那样上涨；（3）基于物价现状和预期，货币政策面临的挑战。专家组成员就这些问题提出了他们的看法。

（1）小林庆一郎（Keiichiro Kobayashi）（庆应大学）

关于（1），专家组成员小林（Kobayashi）强调了日本需求疲软。他首先指出，原因是由于日本的重点是防止新冠肺炎疫情感染的传播，日本对特定数量感染的社会限制比美国和欧洲更严格。此外，获得聚合酶链反应（聚合酶链反应）检测的持续困难也加剧了对不知道谁被感染的“对手风险”的担忧。关于第（2）项，他认为，奥密克戎病毒毒株及其变种的爆发可能对需求造成下行压力，从而对物价造成下行压力，而供应中断和乌克兰局势同时也可能造成成本推动冲击。关于（3），他指出，应继续采取宽松的货币政策，以应对需求不振。他还表示，最好是通过再分配财政政策来应对成本推动的冲击。此外，虽然这方面的资金应该来自临时增加政府债券的发行，但同时政府必须加强其中长期财政结构调整的承诺。

（2）渡边努（Tsutomu Watanabe）（东京大学）

关于（1），专家组成员渡边努（Tsutomu Watanabe）观察到，在日本和美国，2020年新冠肺炎疫情大流行之初对被感染的恐惧在相同程度上改变了人们的消费行为，并在相当程度上压低了消费者价格通胀率。然而，自2021年初以来的事态发展不能用消费行为的变化来解释，而应该用劳动力供应行为的变化来解释。在美国，对被感染的恐惧导致了如雨宫正佳（Masayoshi Amamiya）在

开幕致辞中强调的“大辞职”或“大退休”，而在日本，没有观察到这种现象，导致了工资和物价发展的差异。关于（2），渡边努（Tsutomu Watanabe）认为，鉴于日本家庭持续感到恐惧，存在类似于美国的劳动力供应下降、工资和物价上涨的风险。关于（3），他指出，就货币政策行为而言，日本正处于一个困难阶段，因为它需要同时适当地解决两个问题：“长期通货紧缩”，这是自疫情爆发之前就已经发生的，以及“严重通货膨胀”，这是商品价格上涨和其他因素造成的。以工资作为一个具体的例子，他指出，虽然鼓励加薪的政策对应付长期通货紧缩是必要的，但为了应付严重的通货膨胀，则有必要抑制加薪，因此很难决定应采取哪一项措施。

（3）内田真一（Shinichi Uchida）（日本银行）

关于（1）和（2），专家组成员内田真一（Shinichi Uchida）指出，除了劳动力参与率下降之外，需求强劲也是导致美国高通货膨胀的一个因素。他进一步指出，在欧洲，不断上涨的能源价格是高通货膨胀的主要原因。他指出，相比之下，日本商品层面的消费者物价指数（CPI）的分布出现了一个为零的大峰值，并补充说，这与新冠肺炎疫情大流行前保持不变，而且存在“物价不变”的稳定常态。关于（3），他指出，尽管美国和欧元区近年来新引入的非对称货币政策框架（考虑到名义利率的有效下限）对需求冲击是稳健的，但如何应对成本推动的冲击是一个困难的问题。相反，对于日本来说，通过放宽货币政策，使工资和服务物价上涨，实现劳动力市场紧缩是非常重要的。

4.2 讨论

在专家组成员发言后，包括与会者在内进行了讨论。

（关于新冠肺炎疫情大流行导致的行为变化）

专家组成员渡边努（Tsutomu Watanabe）问小林（Kobayashi），当疫情在未来暂时消退时，日本人对新冠肺炎疫情的恐惧是否会继续。小林指出，虽然不确定性极高，但他认为，部分老年人和医务人员将继续保持警惕，而一般企业和年轻人将不那么警惕。但他补充说，考虑到日本的医疗体系等因素，谨慎应对新冠病毒的措施很有可能会继续下去。

若田部（Wakatabe）认为，美国的“大辞职”或“大退休”不仅是恐惧的结果，也是其他因素的结果，比如金融产品价格上涨导致养老金资产增加，以及人们优先考虑的事情发生变化，包括更加重视休闲时间。他接着表示，日本劳动力参与率下降的风险可能很低，因为日本在很大程度上没有出现类似的发展。专家组成员渡边努（Tsutomu Watanabe）认为，若田部（Wakatabe）指出的因素可能起到了一定作用，但同时强调这些因素中的任何一个都将对劳动力供应产生永久性的影响。

宇南山（Unayama）提出了这样一个问题：人口结构（包括老年人的比例）是否可能在当前阶段日本、美国和欧洲之间的消费价格趋势差异中发挥了作用。专家组成员渡边勤（Tsutomu Watanabe）指出，美国和日本一样，是老年人改变了他们的行为，他认为，疫情可能导致老年人在劳动力供应方面行为的结构性变化。专家组成员小林（Kobayashi）指出，因为日本的老年人更容易患上严重疾病，在人口中占据份额的更大，因此日本对特定数量感染的社会限制往往比美国和欧洲更严格，他认为这种趋势将继续下去。

若田部（Wakatabe）询问，专家组成员小林（Kobayashi）所指出的“对手风险”是否可以通过政策措施来降低。小林（Kobayashi）回答说，在医疗保健政策方面需要采取进一步行动。仲田泰祐（Taisuke Nakata）同意小林（Kobayashi）的观点，并表示新冠肺炎应对措施可能是一个可能抑制日本经济未来增长的风险因素。

（关于“慢性通货紧缩”和“急性通货膨胀”的风险）

主持人青木（Aoki）问专家组成员小林（Kobayashi）和内田（Uchida），他们将如何评估渡边勤（Tsutomu Watanabe）提出的“慢性通货紧缩”和“急性通货膨胀”的风险。小林（Kobayashi）指出，在日本，由于包括新冠疫情大流行在内的经济不确定性导致的需求低迷，存在持续慢性通货紧缩的风险，而与此同时，由于“工资-物价螺旋上升”，存在严重通货膨胀的风险。然后他提出，适当的做法是通过财政政策应对严重通货膨胀的风险，并通过持续的货币宽松应对长期通缩的风险。内田（Uchida）同意小林（Kobayashi）的观点，并补充称，日本更大的风险是长期通货紧缩的风险。由于经济增长缓慢，日本利率可能会跌至零利率下限。黑田东彦（Haruhiko Kuroda）强调了继续放松货币政策的重要性。他表示，在日本，大部分资源依赖进口，能源价格上涨将通过降低家庭实际收入和恶化企业利润，对经济产生负面影响。

福田（Fukuda）问专家们对于为降低长期通货紧缩风险而放松货币政策可能加剧严重通货膨胀造成的相对物价扭曲的风险有何看法。专家组成员渡边勤（Tsutomu Watanabe）指出，长期通货紧缩导致的相对物价扭曲也影响了资源配置，并认为很难判断是严重通货膨胀还是长期通货紧缩对经济福利的影响更大。专家小林（Kobayashi）认为，严重的通货膨胀可能会导致相对物价的快速变化，可能会对经济产生更大的影响。专家内田（Uchida）指出，国内能源价格上涨的主要原因是以美元计价的物价上涨，货币政策可能只会产生很小的影响。

（关于货币政策应对）

主持人青木（Aoki）问专家组成员渡边努（Tsutomu Watanabe），在成本推动冲击和零利率下需求不足两种不同情况下控制预期是否存在差异。渡边努（Tsutomu Watanabe）回应称，与零利率下需求不足的情况不同，成本推动的冲击在稳定产出缺口和通货膨胀之间产生了权衡，因此问题在于引导预期的方向。他接着表示，就美国而言，只应对“严重通货膨胀”就足够了，因此通过承诺收紧货币政策来压低通货膨胀预期就足够了；然而，就日本而言，有必要同时应对“长期通货紧缩”，因此这不仅仅是承诺收紧货币政策的问题。

专家内田（Uchida）问，鉴于目前经济活动和物价的预期，即使货币政策没有对大宗商品价格高升做出反应，是否也不会出现严重的滞胀风险。专家组成员小林（Kobayashi）指出，如果成本推动冲击的影响不是特别严重，最好保持当前的政策，同时密切监测物价发展。此外，他重申了自己的观点，即用财政政策应对能源价格上涨是合适的。专家组成员渡边努（Tsutomu Watanabe）认为，如果不解决能源价格上涨的问题，可能会导致家庭削减支出，压低物价，导致物价变化分布中接近于零的商品增加；换句话说，通货紧缩压力将加剧。内田（Uchida）指出，能源价格上涨的更有可能影响是渡边努（Tsutomu Watanabe）指出的影响。他补充说，如果有一个机制，可以使得严重的通货膨胀成为克服长期通货紧缩的“桥梁”，那么该机制就是服务通过更高的工资推高物价。

植田（Ueda）就美国推迟加息与美联储最新采取的平均通胀目标政策之间的关系，以及美国未来通货膨胀超过政策制定者预期的风险发表了看法。专家组成员内田（Uchida）指出，2%的平均通货膨胀率的政策目标已经达成，平均通胀目标本身并没有成为政策的约束，但美国和欧洲的中央银行确实敏锐地意识到通货紧缩和“日本化”的风险。他还指出，推迟加息的原因可能是对通货紧缩而非通货膨胀的担忧。专家组成员渡边努（Tsutomu Watanabe）指出，美联储最初错误判断了劳动力参与率的发展，认为通货膨胀的上升是暂时的；然而，现在美联储正在仔细研究劳动力参与率的发展，不太可能错误判断未来的通货膨胀发展。

仲田（Nakata）指出，尽管日本还未能实现其物价稳定目标，但消费者价格通胀率保持稳定到人们不关心的程度，可以被视为一件好事。

（关于货币和财政政策以外的刺激需求措施）

谈到奥利维耶·布兰查德（Olivier Blanchard）提出的“刺激需求的替代方法”⁴作为日本经济的补救措施时，小枝纯子（Koeda Junko）问道，除了货币

⁴ 奥利维尔·布兰查德（2021）“为什么低利率迫使我们重新审视财政政策的范围和作

和财政政策，是否还有其他方法来刺激需求。专家组成员渡边努（Tsutomu Watanabe）指出，虽然他不知道布兰查德提案的细节，但马丁·费尔德斯坦（Martin Feldstein）提出并随后在理论上加以改进的通过提高消费税而减少所得税的方法，⁵可以被视为一种非财政政策，因为它是税收中性的。这可能是克服“慢性通货紧缩”的有效政策反应。

4.3 专家的结束语

最后，专家组成员对讨论做了结束语。

专家组成员渡边努（Tsutomu Watanabe）强调，需要更好地理解“慢性通货紧缩”和“急性通货膨胀”并不能很好地相互抵消，需要不同的应对措施。此外，他对长期通货紧缩的经济代价比严重通货膨胀的经济代价更容易被低估表示关注，并指出整个社会也必须了解对长期通货紧缩做出适当反应的必要性。

专家组成员小林（Kobayashi）指出，新冠肺炎疫情大流行增加了一个导致日本长期通货紧缩的因素，并认为整个国家应该进行医疗保健系统改革，以应对这一流行病，这也削弱了导致长期通货紧缩因素的影响。

专家组成员内田（Uchida）指出，一些与会者在研讨会上建议，目前人们不关注通货膨胀的情况可能是可取的。他认为，2%的物价稳定目标是比0%更可取的原因是有效名义利率下限的存在，而且世界各地的中央银行都有相同的目标，这有助于稳定汇率。但他指出，所有政策都有成本，真正的问题是政策的效果和成本是否平衡。在这方面，他指出，虽然许多专家认为现行的宽松政策有导致金融失衡的风险，但为了在货币政策的实际执行中解决这种风险，需要进行更实际和更复杂的分析，并进一步推进理论。

5. 闭幕词

最后，若田部（Wakatabe）回顾了研讨会的发言和专家组讨论，并总结说，研讨会就日本物价发展特征进行了生动而有意义的讨论，并提供了许多对未来货币政策行为有用的见解。他指出，2001年“日本银行物价稳定研讨会”讨论的三个主题“物价衡量问题、物价稳定的定义和理想的货币政策行为”，在本次研讨会上再次得到了讨论，并指出这些问题是中央银行应该持续研究的问题。

若田部（Wakatabe）指出，关于统计问题，包括价格的测量，有一个具体的例子，即清水千弘（Chihiro Shimizu）强调的租赁和业主自住房市场之间的

用:45个要点”，<https://www.piie.com/blogs/realtime-economic-issues-watch/why-low-interest-rates-force-us-revisit-scope-and-role-fiscal>

⁵ Correia, Isabel, Emmanuel Farhi, Juan Pablo Nicolini, 和 Pedro Teles (2013) “零边界上的非常规财政政策”，《美国经济评论》，Vol. 103 (4), 1172 - 1211 页。

分割，是 20 年来的一个研究主题，也在 2001 年的“日本银行物价稳定研讨会”上进行了讨论。

对于物价稳定的定义，若田部（Wakatabe）指出，重要的是要考虑由美联储前主席格林斯潘（Greenspan）所说的物价稳定的概念，即“家庭和企业不必将对平均价格水平变化的预期纳入其决策”，在“日本银行物价稳定研讨会”上也被提到了，与在本次研讨会上也提到了“理性忽视”的概念之间的关系。换句话说，即使当消费者价格通胀率徘徊在接近于零的水平时，经济主体不关注物价变化是理性的，但这样的状态是否在社会福利方面是最优的，这是央行应该充分考虑的问题。在这方面，他指出，小林（Kobayashi）和渡边努（Tsutomu Watanabe）关于工资和物价之间联系的讨论发人深省，为了实现物价稳定，通货膨胀率和通货膨胀预期在 2% 左右，考虑劳动生产率增长的工资增长稳定在 3% 左右的均衡状态是必要的。

关于理想的货币政策行为，若田部（Wakatabe）认为，几乎没有必要改变传统观点，虽然用货币政策应对总需求冲击是合适的，但用货币政策应对总供应冲击可能不合适。他还指出，重要的是要根据任何特定时间的形势，不带先入之见地考虑货币政策行为，谨记雨宫（Amamiya）在他的开场白中提到的关键字“谦逊”。具体地说，他认为，什么样的政策是可取的取决于我们关心的未来的风险平衡，例如海外央行和其他机构称之为“日本化”的情况正在成为日本常态的风险、70 年代高通货膨胀的风险或类似两次世界大战期间情况的风险。此外，他指出，一方面，最近能源和食品价格的上涨可能通过需求端对物价施加下行压力；另一方面，由于人们购买这类商品的频率，可能会增加人们对通货膨胀的感知。他认为，在风险方向不确定的情况下，央行应该注意它们之间的联系。

最后，他在总结时重申了上述三个问题的重要性（物价衡量问题、物价稳定的定义和理想的货币政策行为），并表示希望今后定期举行论坛，与经济学和实证分析方面的专家和学者交换意见，并希望通过这些论坛的讨论，包括 5 月 30 日的第二次研讨会，能够更深入地了解围绕物价发展的各种问题。

本文原题名“Characteristics of Price Developments in Japan--Summary of the First Workshop on ‘Issues Surrounding Price Developments during the COVID-19 Pandemic’”。本文作者 Monetary Affairs Department, Bank of Japan, 即日本银行货币事务部。本文于 2022 年 5 月 23 日刊于日本银行官网。[单击此处可以访问原文链接。](#)



上海金融与发展实验室
SHANGHAI INSTITUTE FOR FINANCE & DEVELOPMENT